

年

卷

期

1

2

第

第

社會主義月刊

第一卷 第二期

目 要

世界和平綱領

獨裁與革命

德國政權歸希特勒

中國革命怎樣進行

介紹兩本經濟政策的著作

第三種人與同路人

現代文化一卷一期略評

中國革命的經濟政策

牛欄屋裏的喜劇(小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SEP. 1933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一日 上海社會主義月刊社出版

新民出版印刷公司

◀◀ 營業項目 ▶▶

本公司購置名廠印刷
機器特聘專門技師承
印中西書籍雜誌圖畫
報章股單文憑各式簿

(電話)

三三三三八號

(地址)

上海山海關路南興坊

記無不精益求精交貨
迅速定價低廉
各界惠顧無不竭誠歡
迎

兒童報

每 逢 星 期 一 出 四 版

是 兒 童 的 恩 物



是 兒 童 的 朋 友

五份起碼報費先惠 學校代銷每份二分 郵票代價九五折計算 香港澳門每期加五分 國外郵費每期加五分 國內及日本郵費在內	全預定	半預定	紀 念 定 戶	全預定	半預定	零售	訂購
	一〇〇	五〇		一〇〇	五〇	一	敬期
	大洋二元五角	大洋一元三角		大洋三元	大洋一元五角	大洋三分	價 目

定 報 處 上 海 山 東 路 二 八 號 晨 報 社



一日之計在於晨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諸君當此春光明媚，朝暾初上之時，將如何籌劃一天之工作乎？

盥漱既畢，諸君入餐室，進晨餐，有最佳之佐餐品為諸君所必需者，即為上海異軍特起之**晨報**。彼有簡潔之文字，精美之圖畫，能詳告諸君以「國家大事」，「國際風雲」，「工商學界消息」，且能指導「婦女與家庭」，使大家獲享幸福，並介紹文藝科學醫藥法律經濟工程等各項專門智識，同時指示「每日電影」的映演批評。使諸君公餘之暇有正當的消遣，以回復其疲勞之精神。故諸君每日讀此一份**晨報**，不啻清晨即得一良好之伴侶與顧問。



一天辛勤之後

不但如此，晨報社另於每日下午四時發行
新夜報，當天送達，故諸君直接向晨報
 社定閱**晨報**者，每天朝夕可以閱讀兩種報
 紙。一天辛勤之後，晚餐既畢，坐安樂椅中，
 烟絲繚繞，悠然神往之際，亦正有大好之讀物
 也。

晨報定價

本國及日本(每月)大洋七角(三個月)
 二元(六個月)三元六角(全年)七元
 蒙古新疆每月一元 香港澳門每月一
 元四角 歐美南洋每月二元 寄費在
 內報費先惠郵票九五計算

新夜報定價

本埠(每月)大洋四角(三個月)大洋一
 元(六個月)大洋一元八角(全年)大洋
 三元四角
 外埠(每月)大洋五角(三個月)大洋一
 元三角(六個月)大洋二元四角(全年)
 大洋四元五角 本外埠寄費一律在內
 報費先惠郵票九五計算

優待學生

如能證明其確為學校學生得享受特別
 權利每定報兩月祇須繳費一元

社址 上海山東路二八〇號

電話九一四九四

晨報 創刊『婦女與家庭』逐日編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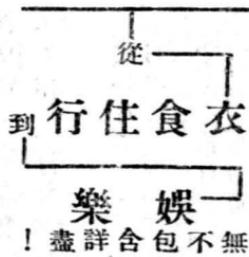
現代婦女生活的良伴

摩登家庭快樂的鑰匙

四大目的

- ★ (一) 解決婦女在家庭間一切困難的問題
- ★ (二) 引進婦女在家庭間一切愉快的生活
- ★ (三) 指導婦女在家庭間一切繁重的工作
- ★ (四) 供給婦女在家庭間一切娛樂的材料

定閱晨報可以節省(時間……編制新穎
金錢……定價低廉)



社會主義月刊 第一卷 第二期

目次

頁數

—— 世界和平綱領……………導 平(一)

目

- 一 社會意識與社會組織
- 二 國家組織與協力主義
- 三 民族的國家發展爲世界的國家
- 四 和平的世界

次

—— 獨裁與革命……………S W(三一)

- 一 獨裁的社會基礎
- 二 蘇俄革命與意大利革命
- 三 中國革命的獨裁基礎

(1) 德國政權歸希特勒……………胡伏生(三九)

中國革命怎樣進行……………李甯(四六)

引言

一 發展民族資本

二 培植民衆的武力

三 澄清政治

四 確立正義和平的外交政策

介紹兩本關於中國經濟政策的著作……………沈修節(六〇)

1. 經濟救國革命論

2. 有利流通券與金融信用

第三種人與同路人……………S W(六五)

現代十二月號略評……………徐曾燦(七一)

現代文化一卷一期略評……………揚帆(七三)

中國革命的經濟政策……………周毓英(七八)

牛欄屋裏的喜劇(小說)……………周毓英(一〇四)

世界和平綱領

導平

上篇 理論

- 一 社會意識與社會組織
- 二 國家組織與協力主義
- 三 民族的國家發展爲世界的國家
- 四 和平的世界

上篇 理論

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有牠的理論。沒有理論做行動的基礎，無論什麼微小的事情都建立不起來。我們喝一口水，走一步路，也自有其理論過程。我們爲什麼要喝水？應該喝怎樣的水？怎樣可以弄得到水喝？這些都是喝水應有的理論。雖然人們日常喝水並沒有捧着杯子去考慮那些問題，然而這些理論是存在着的。大概人們的行動成了習慣以後，認識與行動已滲合爲一，理論的事就被人們忽略了。

孫中山先生主張「知難行易」，便是把人們忽視理論的過失校正過來了。宇宙的真相複雜異常，巧妙異常；但只怕人們不知道，人們一旦知道了，那就煤可以燒火，蒸汽與電力可以做機器的動力，

飛機可以在空中飛翔。現在人們所已知的只是宇宙真相的幾十萬分之一，未知的還很多。我們就在那已知的幾十萬分之一的智識說，這些智識已不知耗費了幾千萬萬人的精力，耗費了幾百萬萬萬年的壽命。淺見的侏儒們以為讀書十年，就可知天下事，這是太誇大而無恥了。試問在古代教育未改善，印刷未發達，你也能讀書十年就知天下事嗎？何況那些侏儒們所知的只是「已知」，而並不是什麼新發現的「未知」啊！

孫中山先生所說的「知」是知，「未知」是行，「已知」所以「知難行易」，非但是革命的事實，也是日常的事實。我們如不惜顛倒事實，說「行」是行，「未知」那末這種論理簡直是超出人類以上了。「未知」也可以「行」，請問那樣的人還有沒有理性呢？人的所以異於禽獸，在有理性，能知而後行，能在未知中求已知。至於孫中山先生所說「不知亦能行」，乃是指點跟着先知先覺或後知後覺的人們，去行那「已知」的事，就使本人是一個不知不覺的也可以做到，並非說世界上任何人所不知的事情都可以行的。否則人類難道可以和禽獸一樣，但憑着物理的衝動去不知而行嗎？

法西斯蒂的行動，粗淺地看去好像是不講理智，不求理論的。但我們應知法西斯蒂唯一的靈魂是信仰，如果一個法西斯蒂組織中設有一個堅確而廣大的信仰，這個法西斯蒂便一步都不能動。所謂信仰便是靠理論求得的。莫索里尼的理論造成莫索里尼的人格，而莫索里尼的人格又博得了意大利人民的信仰。否則莫索里尼也不過是個平凡的意大利人，決不能成爲全世界人民所欽動的法

西斯蒂領袖。法西斯蒂只是政治科學中的一種方式，科學是多邊性的，法西斯蒂當然也是多邊性的。說法西斯蒂沒有固定的政治內容，那正是說明了法西斯蒂在科學上的堅強基礎；但如說法西斯蒂沒有一貫的理論，這實在是無知。法西斯蒂的理論在一切政治科學中，實是最明確，最快速，而最切合現實的。孫中山先生把人類的社會層分爲三種，一是先知先覺，二是後知後覺，三是不知不覺。先知先覺者憑着明銳的理論和艱苦的精神成立偉大的革命的英雄的人格，藉以集中後知後覺與不知不覺者的信仰，而迅速地使理想變爲現實。這正是三民主義偉大的地方，同時也正是法西斯蒂可貴的地方。

現在全世界的人類正切盼着一個問題，這問題便是「世界和平」。孫中山先生的思想，一開始就是從「世界大同」發展出來的；到了臨終的時候，還囑咐大家要「和平奮鬥」。可是現在的人們就只是想無條件的和平，想從天上或幻夢中求得和平。假如和平可以從天上或幻夢中求得，那末和平也不必待現在的人們來講，在耶穌的時代，在釋迦的時代，在托爾斯泰的時代，早就實現和平了。

談到和平，至少我們應該先知道怎樣和平？世界是否能夠和平？否則不先求知，但像小孩子般帶着一付苦臉，到東哭嚷着要和平，到西也哭嚷着要和平，結果你哭來哭去，嚷來嚷去，世界還是不得和平。我們愛和平，我們先要深信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積極學習列甯和莫索里尼的偉大。我們不妨讓那些空頭的人道主義學者去努力和平運動，去煽動着全世界的人類起來哭嚷和平，哭嚷十

年百年，但我們不得不抽出寶貴的時間，一點鐘或一分鐘也好，先求得如何實現和平的智識。

一 社會意識與社會組織

馬克斯對於人類的意識作用，首先有了進步的認識，他揭破了唯神論，更進而揭破了唯心論。不幸馬克斯在個人意識與社會意識之間沒有明白的認識，一方面打破了偏狹的唯心論，却在另一方面建築了偏狹的唯物論。宇宙一切離不了物質，但單純的物質不能組成社會，並且物質不能進化，而社會是能進化的。把物去解釋社會，解釋宇宙，表面上雖然與現實相形似，但這祇說明了「甲是甲」，對於社會的進化仍舊沒有說出什麼。

「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社會的存在，倒是社會的存在決定人類的意識。」這是馬克斯的一句名言，但就在這一句名言中我們可以明白馬克斯的錯誤。原來社會不是什麼怪物，社會只是許許多多的個人的組織體，在一個共同的關係之下，一個社會便生存着，而且活動着。但人類靠什麼能夠維繫在一個共同的關係下？這不是心，也不是物，而是人類的意識。人類有意識，所以能明白利害，能辨別是非，能進一步組織社會。人類如沒有意識，社會是要土崩瓦解的！

社會決定個人，多數決定少數，那在個人意識與社會意識的鬥爭過程中原是無法推翻的公律。可是社會是由個人組織起來的，多數是由少數成長起來的，我們如機械地在社會與個人之間，多數

與少數之間，毫無理由地劃入一條鴻溝，這種錯誤便是不可恕的罪惡。馬克斯貿然說「社會的存在決定人類的意識」，他顯然沒有認清社會與個人之間的關係。否則離了意識，社會根本無從尋覓，一堆石子不能變成社會，一羣野狗也不能變成社會。社會不是上帝來組織的，也不是什麼天神鬼怪來組織的，而是由於意識的維繫作用，人類自動起來組織的。人類能組織社會，為什麼人類反不能決定社會改變社會呢？人類如其不能改變社會決定社會，那末為什麼人類還要從事革命，做社會的改進運動？難道革命也是上帝所規定的不可逃避的任務嗎？

人類意識的發展能決定社會的存在，那是一定的。人類的意識發展到怎樣的程度便組成怎樣的社會，那是自有歷史以來便頑鐵般存在着的事實。圖騰意識的人類組成圖騰社會，宗教意識的人類組成宗教社會，宗族意識的人類組成宗法社會，都市意識人類組成都市社會，農村意識的人類組成農村社會，封建意識的人類組成封建社會，共產主義意識的人類組成共產主義社會，社會主義意識的人類組成社會主義社會……總之，有各種各樣的社會意識出現，便有各種各樣的社會組織出現。一羣強盜霸住了一個山寨，這個山寨便會成功一個特殊的強盜社會；一羣妓女聚居在一個弄堂裏，這個弄堂便會成功一個特殊的妓女社會。

各種各樣的社會，由各種各樣的意識做出發點，——當然，人類的意識不是生下來就固定着，是隨着生活條件變動的。但所謂生活條件，並不單指物質生活，主要的是教育、風俗、習慣以及每個人

本身的生理條件，這裏面有主觀的條件，也有客觀的條件。馬克斯把多方面的決定人類意識的生活條件忽略了，單只拘泥於物質生活以求強合於唯物史觀，殊不知單純的物質生活並不能解釋一切。列寧是貴族，但列寧做了俄國革命的領袖；孫中山先生和莫索里尼是平民，他們却同樣做了中國革命和意大利革命的領袖。同樣是工人，有的工人革命了，但有的工人却反動了。若以爲同一的物質生活便能組成同一的社會，形成同一的意識，這不是奇談，便是神話！我們絕不否認物質生活對於人類意識的影響，但這些影響只是許多影響中的一種，並且是一般的人們最容易感覺到的一種。

人類所以能認識字宿，能組織社會，物質生活只是牠的結果，而人類的意識活動才是牠的動力和因子。否則在原始時代，在未開化的時代，人類和猿猴以及其他高等動物的物質生活是完全一樣的，但爲什麼人類能夠進化到現在的地步，而猿猴以及其他高等動物還是和千萬年前一樣呢？人類與猿猴在同一的物質生活環境中演化出來，人類有意識，能奮鬥，所以人類進化了。猿猴的意識因有生理上的各種限制，牠們雖比其他高等動物進步得許多，但終不能像人類那樣的能迅速發展，猛烈進步。

並且，人類與猿猴之間還有一個極大的差別，這個差別使人類與一切的動物劃分了界限，那就是人類的意識已進而組織成一個個的社會的意識，而猿猴的意識却仍舊是各個分散的。在猿猴羣中，各個猿猴的意識都各自獨立不相關聯，更無所謂統一的意志。人類有社會，個人只是一個社會的

細胞，個人雖各有個人的意識，但個人意識是完全要受整個的社會意識支配的。這好像許多的人體細胞組成了「人」，又集許多的「人」組成另一種「生物」，這個「生物」的名字便叫「社會」。社會對於個人的支配權力，就像整個的人體支配各個細胞一樣，任何有力的個人都逃不出這種支配權力。雖如集政權軍權於一身的國家元首，他的權力可算大極了，可是他要想違背了社會意識而與整個的社會支配權力去對抗，縱使他的英雄的材幹超過了拿破崙，然而他却不得不失敗！

社會意識既是這樣的重要，而且有這樣大的權力，那末究竟什麼是社會意識呢？——俄國的馬克斯派學者波格達諾夫曾有社會意識學大綱的著述，其他各國學者對於所謂「意識形態」的著述也很多，可是他們都被馬克斯的唯物論的觀念限制着，竟沒有方法去觀察社會意識的本質，都只浮面的討論一些外表的問題。因為一討論到本質問題，立刻會把唯物論的體系打得粉碎，馬克斯的信徒變成馬克斯的叛徒了。

社會意識不是什麼神怪的東西，牠只是人類共同的統一的意志罷了。在同一的關係下，在同一的意向下，人類企圖着共同生活利益的發展，那末全體的人就會變成一個人一樣的去活動奮鬥，這樣在物質方面的努力便造成人類現實生活的基礎，在精神方面的努力便造成人類社會意識的發展。歷史上，一切物質文明的進步是人類共同努力的結果，但一切精神文明的進步如神學哲學科學的產生也都是人類共同努力的結果。人類所以能夠共同努力，能夠建設光明燦爛的社會，這不是什

麼上帝的意旨，也不是任何英雄性的個人的意旨，這完全是人類社會意識的發展。

人類因為有尖銳的意識，人類所以能認識自然，認識宇宙，在認識的過程中，人類就產生了共同的信仰，因為有了共同的信仰作用，整個的全體一致的社會意識就產生了。人類若沒有共同一致的信仰作用，人類恐怕永久只是渙散的一羣，和其他高等動物下等動物一樣的渙散着，絕沒有組織社會的可能。然而人類因為能認識，有信仰，所以共同一致的社會意識產生了，同時社會組織也產生了。

社會組織以社會意識為生命，社會意識則以人類的信仰為生命。講到人類的信仰，我們便不能忽略古代圖騰學宗教學的價值。人類並不是一開始就知道崇拜科學崇拜社會。古代的人們崇拜實物，崇拜鬼神，正是開了現代的人們崇拜科學崇拜社會的端倪。人類在最初，原沒有所謂共同意旨，更沒有什麼社會意識，但自從人類進化到了拜物教的信仰，進化到了圖騰社會，在同一個「物神」的信仰下，便開始形成了一個圖騰的社會意識，這個圖騰的社會意識便成了圖騰社會的存在基礎。圖騰社會以後，物神的信仰不能滿足人類的要求，人類需要更進步的信仰，於是產生了更進步更美滿的神，這個更進步更美滿的神發生信仰的作用，便形成宗教的社會意識，於是宗教社會成立了。宗教社會經過了長久的時期，人類對於那幻不可得的玄妙不實的神也不能再滿足，人類所需要的是現實生活，而神所給與人們的却完全是空想和幻夢，於是神學以後便發生了哲學。哲學一般的作用只是神學的現實化，把人類中的英雄抬舉起來，把英雄來代替了神，而歷史上所有的聖君賢相，英雄豪傑，

便都成爲人類信仰的中心了。在「上帝」的信仰下造成歐洲社會，在「聖賢」的信仰下造成中國社會，在「佛陀」的信仰下造成印度社會。印度、歐洲、中國，他們的信仰不同，他們的社會意識不同，他們的社會組織社會生活便也不盡相同了。

歐洲與印度，他們的社會始終都帶着濃厚的宗教氣味，而中國却很早就是哲學佔優勢的社會。中國的民間雖然仍流行着種種鬼神奇談，民衆仍不免拜神拜鬼，但游離於智識份子的成爲政治基礎的社會意識，却始終離不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講哲學歐洲人在學術上的研究起初似乎遠勝過中國，希臘時代的哲學思想，比中國戰國時代的哲學思想不相上下，但歐洲因受希伯來思潮的打擊，凱撒（皇帝）的專制政治不得不在宗教上建築基礎。中國却是很順利的，差不多一開始帝皇專政就與哲學理論相合流。所以歐洲在文藝復興以後，常常鬧着「政教分離」和「政教合一」的問題，這在中國是沒有的。

人類的信仰進步到了哲學的階段，這時與科學已經很接近了。但爲什麼科學的出現反在神學佔優勢的歐洲，而在哲學佔優勢的中國呢？這是因爲中國的哲學自與現實合流以後，專制帝皇爲要保持他們統治地位，極力排斥所謂「異端邪說」，甚至連工藝上的研究也認爲彫蟲小技，一律加以排斥。這樣，中國的哲學就永久只是「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不能再有新發展，科學自然沒有產生的餘地了。可是在歐洲，歐洲專制政治的基礎完全建築在宗教上，皇帝只要人民不去侵犯那

些爲專制辯護的教條，民衆去研究任何派別的哲學都不加干涉。歐洲的哲學在民間開放着，有着普遍的不斷的受者們的熱血和生命培植上去，於是歐洲的哲學發生了科學，然而中國的哲學却還壓在皇帝的金輓之下呢！

哲學嗎？哲學是人類經歷中一個幽長的階段，尤其中國人是受盡了哲學的痛苦。現在科學出現，哲學是要結束牠的生命了。馬克斯主義者還悶悶然的想把哲學再掙起場面來，把唯物哲學渲染得神乎其神，大掉其認識論，本體論，方法論的槍花。其實科學就是現代最優秀最特出的認識論，本體論和方法論。只可惜最早的人們迷信神，後來的人們迷信某一種人（英雄），現在馬克斯主義的先生們却又迷信「物」了。我們如認清社會組織與社會意識的關係，我們如把社會意識超出哲學的限制而把牠放到科學中去討論，那末我們就知道人類的信仰非但不應該是神，不應該是某一種人（英雄）並且也不應該是物，而應該信仰全人類有關的科學，信仰全人類組成的社會。宇宙是物質組成的，社會却是意識組成的，社會組織的過程根本就是科學發展的過程。人類最後的信仰是科學，那末人類最後的組織便是世界！

二 國家組織與協力主義

一個社會的成立，至少要有三個條件，第一要有以人爲主體的生活成員，第二要有固定的物質

生活的基礎，第三要有一定的精神生活的規範

童話專家可以憑着生花妙筆寫出一個物的社會，宗教家或哲學家可以憑着玄想說出一個神的社會或半神的社會。可是那些「物的社會」、「神的社會」和「半神的社會」都只是玄幻的空想，甜蜜的好夢，實際上沒有這回事。社會若不以人為主體，這便不成其為社會。又社會必定要有固定的經濟（物質生活）基礎如農村社會的農業和都市社會的工商，否則像學校裏的學生和客店中的旅客他們是絕不能組成爲固定的社會的。又社會必定要有一定的生活規範（精神生活）如奴隸社會的主人和奴隸，如圖騰或宗教社會的敬物和敬神，否則一羣毫無信仰的人而要他們去組織社會，那是滑稽荒謬。

依照上列的三個條件說，在·目·前·最·活·潑·而·有·強·力·的·組·織·性·的·社·會·，很·顯·然·的·應·該·是·國·家·。一般政治學家說組織國家的三個要件是人民，領土，主權。但我們如照社會學的说法，那末國家的三個要件便是：第一有生活構成員的人民做主體，第二有固定的經濟基礎（如工業，農業及金融組織等，單有土地已經不夠了，因爲居住南北極的土人雖有土地却不能成爲國家。）以供應人民的物質生活，第三有一定的生活規範（如政治，法律，軍隊，警察，宗教，教育，倫理，道德，文化，風俗，習慣等等。中國現在對外不能自主，政治，教育，軍隊，警察又不健全，這方面是很欠缺的。）以維繫國家的組織關係。國家因爲有了上述三個社會組織學上的要件，所以國家這個社會比較的具有永久性和活動性，而其他

一切的社會都要在國家組織的掩護和維持下才能存在。如果某一種社會與國家相衝突相矛盾，這種社會是要受國家的取締和壓迫而逐漸消滅的。

國家的成立，本來是極端自然的。牠是爲了謀人類共同生活的利益，依據於一種協力主義的思想而產生的。從來有許多學者，有的說國家的成立是根據於契約的結合，有的說國家的成立是根據於階級的壓迫，事實上國家的組織絕對不會這樣簡單。

集合千百萬人訂立了契約便能成立了國家，而且成立了以後便永遠不許分散，世界上決不會有這樣神聖的天經地義的契約。難道國家的組織會像人們組織家庭一樣只要簽訂一張婚約就可以實行同居嗎？人們結婚了還有時要離婚，欠債了還有時要賴債，僱傭以後還要解僱，國家却從沒有這樣離婚，賴債，解僱的事情。國家只有在協力主義的原則下，或明或暗的去改變法律，變換組織，有時爲了整個國家的利益，還不惜使局部的或少數的人受犧牲。這樣，國家契約說的理論更說不過去了。歷史上從來沒有看見誰與人家訂立了契約而叫自己去犧牲的事，但歷來爲國家而犧牲的人我們真計算不清呢。

至於國家成立於階級的壓迫，這種說法更是一相情願的。一些憤世嫉俗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半無政府主義者（共產主義者），他們對國家懷着妒恨，他們不願社會有健全堅強活潑的組織，他們看見國家存在妨害了他們的自私的階級的利益，於是他們便揭竿狂喊起來，主張不要國家。其實社

會不會這樣簡單，你們不需要國家，却自然有需要國家的人出來組織國家。以有組織有紀律的羣集向無組織無紀律的羣集進攻，無政府主義者結果只有痛敗！何況現在世界上的人類到處都是有組織有國家的，高妙玄想的無政府主義者只好到荒島絕域上去尋覓原人和野蠻人，但也得謹慎小心，因為帝國主義開拓殖民地的軍艦正跟在他們的後面。萬一疏忽的話，無政府主義者正好做了帝國主義的奸細，蒙蔽了落後民族的思想，好永遠維持着帝國主義的血淋淋的統治！

★

★

★

★

國家是協力主義的組織，這在政治上是如此，在經濟上也是如此。經濟學上所斤斤爭辯的分工合作，自始便是以協力主義為出發點。人類要生存，人類便必須從事生產的工作，但為了生理與訓練的關係，一個人兼做數項工作總沒有一個人獨做一項工作來得便利，於是人們依着組織的協力的意義，實行分工合作了。人類最早的分工是男子和婦女小孩兩組，接着男子又分成農和工，而工和農之間又各自分成許多分業。但這些分業，都是直接的圖謀經濟利益的。共同生活的範圍小，協力的組織自然也簡單，一、二家長或族長管理着全體，便可以維持團體間的協力關係了。

原始氏族社會以後，人類的協力制度開始由經濟的協力擴大到政治的協力了。共同生活的範圍由數十數百擴大到數千數萬，人類除簡單的物質生活以外，還有一個幼稚的精神生活，這幼稚的精神生活便是圖騰或類於圖騰的崇拜。當時的人類非但在圖騰的意識下決定他們的生活方式，並

且在圖騰的意識下決定他們的社會組織；在共同的圖騰崇拜下圖謀共同的利益，經營協力的生活。

圖騰社會出現，人類的組織範圍擴大，數千人數萬人的協力，牠的秩序已不像數十數百的氏族社會那樣容易維持了。以前只要有一個家長或一個族長便可維持團體的秩序，這時的社會協力關係應該有另一個人來維持了。一個強有力的人，他的膂力勝過團體中所有的人，或者一個有奇跡的人，他的奇跡得到全體的傾信；這便是古代統治數千人或數萬人的會長。會長手下可以有護衛他自己的軍人；可以有傳佈圖騰教條的教士，甚至還可以有若干幫助他統治人民的官吏。這些會長，軍人，教士和官吏，便是爲了社會組織，便是爲了社會協力而產生的。同時這些會長，軍人，教士和官吏的產生，使社會的分工合作的協力制度也有了改變。圖騰社會以前，人類的協力只分工人與農人，婦孺與壯丁；現在除了服務於經濟方面的工人農人以外，還有服務於政治，服務於組織的人，會長，軍人，教士，官吏，他們不務工也不務農，而是專門服務於政治，服務於組織的。會長，軍人，教士，官吏，他們可說是由於家長或族長這個東西發展出來的一種政治上的組織，這些會長，軍人，教士，官吏們完成了圖騰社會的部落組織，同時又開了國家組織的先河。圖騰的教士進化爲宗教的教士，部落的會長統一躍而爲國家的君長或帝皇了。

從來的經濟學家，在討論人類分工合作問題的時候，他們只知道了一些經濟上的協力形態，把政治方面的協力形態完全忽略了。他們知道怎樣的由畜牧分出農業，由農業分出工業，工業又分出

種種不一的匠人，製一個鐘錶要分一百多個部門，製一根針也要分十幾個部門，可是他們就不知道整個的人類在做着怎樣的分工的活動。社會的組織並不只限於農工商，更重要的還有政治組織。政治努力於人類的社會組織，發展人類的精神；經濟則努力於人類的物質生活，滿足人類的慾望。把人類的分工分為政治與經濟以後，其次我們才能夠把政治組織分為官吏、軍隊、警察、教士、教員、法官、律師等等；把經濟組織分為銀行家、產業家、商人、農民、工程師、技師、工人等等。把政治上的分工丟在腦後，我們非但不能明瞭人類協力的意義，並且把社會組織的內容也看得糊塗了。社會惟有政治，社會才有秩序，社會有了秩序以後，經濟上的分工才能保持下去。否則社會秩序解體，政治組織消滅，交易制度崩潰，經濟上的分工怎樣支持呢？

馬克斯沒有像一般庸俗經濟學者完全忽略了政治組織，但他對於政治組織因誤解而發生的罪惡却比庸俗學者還厲害。我們認為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只是人類協力主義的分工關係，在政治與經濟的錯綜複雜關係下，人類就組成了國家。馬克斯却不這樣解釋，他指人類的經濟組織為「下層基礎」，政治組織為「上層建築」，並在這上層下層之間造成了社會階級的壓迫關係，形成了國家的權威作用。

把社會組織分成上層下層，尤其是把政治定為上層經濟定為下層，這實在是使我們驚異的。在古代專制國家，人民不問政事，皇帝高高在上，這也許就是馬克斯所指出的上層下層吧。可是就在這

時代，皇帝的施政也須顧到人民的利益，皇帝違反民意，皇帝便也會倒台。近代民主政治，政黨政治實，民衆不單是生產的主體，並且還是政治的主體，我們更憑什麼去分辨上層下層呢？況實際上政治與經濟之間，不一定都是政治處於上層，在許多經濟發達如英美等國，牠們的實際政治家都須仰隨銀行家的鼻息，銀行家往往做了政治的太上皇帝，坐在幕後操縱一切，這種銀行家難道還是代表下層嗎？

我們不反對分社會的組織爲上層下層，但政治有政治的上層下層，經濟有經濟的上層下層，甚至軍隊，警察，宗教，教育，金融，實業，工人，農民，一切有組織性的東西，都有其上層下層的識別。可是我們如混統地機械地說政治組織是社會的上層建築，經濟組織是社會的下層基礎，那真是從何說起呢。凡在社會成員之間，一切的個人之間，不單有相互的經濟關係，並且也有政治關係。佈滿於民間的一切道德，倫理，風俗，習慣，這些社會關係都是從政治發展出來的，人們知道依各人的能力努力生產，但還知道互相遵守私有權，這就可以知道政治關係不一定高高在上，生產關係總是壓迫在下。

國家是一切社會協力組織的綜合體，是由社會上一切的政治組織和經濟組織的錯綜複雜的關係結合起來的。社會上單有政治組織不能成立國家，單有經濟組織也不能成立國家，同時經濟組織與政治組織間發生矛盾不能維持良好的關係的時候，國家也不能成立。社會的革命現象便是在政治與經濟蘊藏着矛盾的時候爆發出來，用民衆自己的力量來恢復社會的協力關係，安定新興國

家的統治基礎。

無政府主義者與半無政府主義者，他們的認識被現實弄糊塗了，他們沒有看出人類協力的關係，他們沒有看出社會組織的發展，他們沒有看出國家對於人類的作用，就只是放縱着自己的偏見，閉着眼睛狂喊『不要國家！』

三 民族的國家發展爲世界的國家

人•類•最•後•的•信•仰•是•科•學！
人•類•最•後•的•組•織•是•世•界！

現實的世界已到了最後的成熟的時期，人類已到了幸福的時期。可是蕪雜的愚昧的人類的偏見，把人類自己的光明的幸福的時期延緩了。非但是客觀上延緩了光明幸福的時期，主觀上更自造了許多陷阱，使光明與幸福對人類越離越遠。人們信仰社會主義，然而人們却又反對國家。國家是現代世界的社會組織的代表，再沒有比國家更健全更有力的社會組織，我們信仰社會主義，難道社會主義是可以不要組織的嗎？共產主義者以爲未來的社會只要經濟組織，不需要政治組織，所以就不需要國家。但請問：沒有政治組織，經濟組織是能存在的嗎？

社會的組織，是隨着人類的歷史擴大的。氏族，部落，民族，這些都是歷史上社會組織發展擴大的

形態。這些氏族、部落、民族都會有過國家的組織的形態，家長、族長、酋長、元首（皇帝與大總統）便都是這些組織上的統領。現在，社會進步了，科學發達了，一個民族一個地域的組織已不能適應人類的協作了。現在需要打破民族的地域的限制，完成統一世界的國家組織，這樣好使人類得到更大的協力和發展。

不幸一般人的認識，國家似乎只是破壞和平的工具，因為國家常被一些野心的君主和黷武的軍閥利用着去從事戰爭，從事殺伐。為了一個人的尊榮與貪慾，使數百萬數千萬人流血遭難，使全世界不得太平，這難道不是國家的罪惡嗎？不過我們如考察古代，考察沒有健全的國家組織以前的人類，那時的人類社會也一樣的要發生戰爭。部落與部落之間，村落與村落之間，他們的戰爭也常常是很殘酷的。他們的對外觀念比現代的人還要側狹得多，他們是絕對排斥異族的。現在資本主義的美國人民和共產主義的俄國人民還可以往來協力，互謀生活上的利益，可是古代部落社會遇見了異族人民，他們除了捕殺以外簡直沒有別的辦法。並且戰爭開始，雖不見殺人盈野，流血成河，但兩對敵之間總要殺到一死一生，否則不肯甘休。可憐的戰敗者，不被戰勝者捉去宰殺烹食，便要被戰勝者捉去做奴隸。這時代只要戰爭失敗，這時代的人便不能算人，不能享人的權利。大戰失敗後的德國，他們雖受盡了苛酷的待遇，却還能保存他們的組織、生活、文化，這當然與古代部落因戰敗而消滅死亡是完全不同的。我們如考察歷來戰勝者與戰敗者之間的關係，我們也許要相信現代的戰爭在方法上

比古代的戰爭是殘酷了，而在結果上比古代的戰爭是文明了。沒有國家組織的人類既也從事戰爭，我們就知道戰爭是人類的習性，並不是有了國家才有戰爭。

更真實的說，國家非但不會醞釀戰爭，並且還能防止戰爭，這話驟然提出來，也許有人覺得奇怪。中國從來是國家統制力量最薄弱的國家，也是國家觀念最淡薄的國家，惟其如此，這個自誇和平的國家的戰爭才多得無從計數。民國以後，四川一省的內戰據說就有七百多次。假如中國的國家權力強大，政治基礎鞏固，這許多戰爭也許可以一次都不發生呢。再如中國內地的械鬥，這也可以說是小規模的戰爭，因為每次械鬥，也要犧牲多數的人命，演成流血的慘劇，這種慘劇沒有記載，但至少各縣每年有十幾次或者幾十次，假如中國國家的權力強大，那當然是可以禁止的。無奈中國的國家向來不真正是人類協力的、謀利益的、組織、人民、只要完納「皇糧國課」，此外什麼都可「自由」，甚至械鬥也可以自由了。辛亥革命以後，滿清帝皇政府推翻，中國的國家才再回復到協力主義的路上去，械鬥是被取締而消滅了，將來國家基礎更鞏固，在「民有，民治，民享」的軌道上實現協力主義的統治，那末軍閥內戰的局面也很快可以消滅的。

我們又如設想歐洲到現在還沒有國家，或者他們的國家組織都是很落後的，試問他們將怎樣？是不是整個的歐洲要充滿着戰爭呢？現在的歐洲雖天天在恐懼戰爭，但究竟要和平慣了的人才會恐懼戰爭，否則像中國那樣年年都有內戰，在戰爭中討生活，還恐懼什麼戰爭呢？歐洲人恐懼戰爭，於

是便想防止戰爭，著名的「軍縮會議」便是爲了防止戰爭而開的。不過從裁減軍備方面去防止戰爭，那防止戰爭的效力很微小。軍縮能不能實行是一個問題，實行以後能不能真的就消滅了戰爭也是一個問題。

大概人類互相協力的關係，重於互相壓迫的關係的時候，縱使兩方的軍備都非常高強，戰爭仍不能發生。但協力關係極薄弱，而壓迫的關係却一天加重一天，譬如目前經濟恐慌泛濫全球，各國關稅高築，傾銷橫行，相互間陰謀壓迫，日甚一日，就使沒有軍備戰爭也仍舊要發生。中國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幾乎是無國防的國家，可是日本要來侵略壓迫，九一八實行佔領東北，國際間一切尊嚴的條約都化爲廢紙，而東北問題的戰爭終於開始了。不過戰爭也並不一定要軍備好的國家就勝，軍備劣的國家就敗。歐洲大戰時，德國的軍備比任何國家都好，但結果德國一敗塗地。俄國十月革命後，赤軍的軍備是極惡劣的，可是各國聯軍當時並沒有能夠把這軍備惡劣的赤俄消滅掉。現在日本的軍備是很好的，而中國的軍備則很可憐，看起來中國似乎會失敗，可是事實，這却是中國一個抬頭的絕好機會。九一八事變把全盤的民氣都激揚起來了。假如我們認「五四」是中國新思想抬頭的基礎，「五卅」是國民革命統一中國的基礎，那末「九一八」便是中國在國際間抬頭的基礎。以中國人民的狂怒，以世界人民的公憤，來與日本軍閥的黷武主義相抗爭，日本的軍備縱使勝過戰前的德國，日本帝國主義終究要失敗的。日本軍閥失敗於全世界人民的公憤，失敗於中國革命民衆的反抗，但根本

上是失敗於日本民衆於經久的黷武政策下爆發了革命。日本軍閥佔領東三省，本想藉此欺本國人民，緩和日本民衆的革命情緒。但佔領了東三省以後，日本民衆並未得到解放，失業的仍是失業，負債的仍是負債，却要大批的生命和財產徵發到國外去送死。在這些條件下，日本軍閥的失敗是必然的，縱使有堅強的軍備也沒有用。

戰爭既非由於國家，更不是由於軍備，但究竟爲了什麼呢？——現在可以很明白的答覆，人類的有戰爭，完全是因爲社會組織發生了障礙；因爲有了這個障礙，人類的協力關係不能再維持下去，國家與國家之間到了無法欺騙過去無法敷衍過去的時候，戰爭便發生了，和平便破裂了。我們要保持和平，要防止戰爭，唯一的方法便是促進和加深人類的協力關係，使人類相互間永遠只有協力的而沒有壓迫；這樣當然只有求社會組織的更趨健全，更趨完密，才能達到目的。組織是爲了協力，協力一定要在組織中尋覓。現在世界的組織，各國都不相統率，除了一些野心的帝國主義者想佔滅別個國家以外，誰都沒有想到自己要統率於誰，或者怎樣去統率世界。大家只知道爭取本國的自私自利，知道圖謀損人利己，這樣的世界怎能保持和平呢？

本來，人類的組織是隨着人類的意識一天一天地擴大的。人類有意識，所以人類能營共同生活。最早的人類共同生活的範圍，只是一個父系或母系的血族的社會組織，人數至多不過三人五人或者十幾個人，這是原始的家長時代的社會組織，也可說是人類最早的組織。這時人類的組織意識極

薄弱，除了母親以外他們不知道再要尊敬誰。家長時代以後是族長時代，族長大概是從家長中推選出來的。族長時代的社會組織更擴大，便是所謂酋長統率的部落時代。酋長可以是一個人數衆多的族長，但也可以是由許多個族長中推舉或競爭出來的一個統治者。部落時代以後，那便是人類進而組織一民族或一地域的國家的時代了。這時人類意識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有完全的言語，更有完全的文字，各種生活方面的智識也有了相當的基礎，生活資料有家畜與農業的幫助，交通工具也有了相當的發明，於是政治的分工與經濟的分工各各成立起來，國家便出現了。

國家的出現增進了人類不少的幸福，在未有國家以前，一個地域內存在着許許多多的小組織，小部落，這些組織各自爲謀，不相統率，也不相協力，於是這一個地域便不得和平了。甲部落與乙部落戰爭，丁部落又與戊部落戰爭，各個部落爲了本身的利益，戰爭是無法避免的。但因為有國家出現，一個小部落的協力擴大爲一個廣大的全地域的協力，於是部落的戰爭消滅了。協力的圍範愈大，所得的利益便愈多，人類的社會組織所以由狹小而發展到廣大，由原始家庭的形態發展到現代世界的形態，自然有牠的科學的必然的基礎，絕不是偶然的事情。國家的成立必出於人類的公意，否則就使有萬能的上帝或者超人的英雄，牠也不能來獨手創造一個國家。

人類的意識現在已經發展到最後的階段，人類信仰科學，而科學也已經相當發達了。現在的科學雖沒有到完全統一的地步，但神學哲學的偏見已相當失勢，世界上信仰科學接近科學的人已佔

了絕對的多數，甚至是萬分之九九九九的多數，只剩下些微的殘餘，只剩下那些靠神學哲學吃飯的人還在替神學哲學辯護着。經濟沒有國界，科學沒有階級，人們只要真願意，全人類是可以世界的旗幟下面集合起來，組織起來了。

現實的世界是早就需要統一了：談交通，輪船，火車，飛機等等的發明，已溝通全世界為一家；談經濟，則各國經濟祇是世界經濟的一部份，任何國家都不能與世界脫離隔絕；談化學，物理學，機械學等應用科學，則一有發明，立即普遍於全世界，總之，凡屬於人類的一切，一切都已具了世界的形態，但是現有的政治組織却妨礙着人類的世界性的發展。偏狹的民族觀念，偏狹的國家觀念，這些偏狹觀念的存在，便使統一全人類的世界的國家遲遲不能實現了。世界的國家既不能實現，世界的和平當然絕無保障可言，那末國家與國家之間因互相壓迫而發生的戰爭怎能避免呢。

現代世界的三大革命思想，第一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第二是列甯的多數主義，第三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這三大思想都激蕩了世界，而且都已有了現實的基礎。孫中山先生的思想統一了中國，列甯的思想統一了俄國，墨索里尼的思想統一了意大利。我們不要以為這三個思想都不能相容，他們對內的言行也許各有各的特點，但講到對外，講到人類，講到未來世界的發展，牠們的性質是相同的。雖然我們現在要找得牠們相同的地方也許很感困難，但牠們相同的端倪已經有了：列甯講民族革命，首先以世界革命為基礎，孫中山先生講民族主義，一時一刻都沒有忘却「世界大同，

「而法西斯蒂的國家本位主義，其發展的前途實是「國際民族主義。」

列寧的世界主義，孫中山先生的大同主義，法西斯蒂的國際民族主義，這些思想我們如果惡意的存着偏見去考察，好像牠們都是自相矛盾的，非但現實上有矛盾，甚至在理論上也可以尋出或大或小的矛盾來。但目前的社會革命，已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整個世界的問題，那是孫中山列寧和法西斯蒂三大革命思想所一致表示着的。

革命唯一的作用是消除人類的壓迫關係和建立人類的協力關係。所謂世界主義，所謂大同主義，所謂國際民族主義，這些思想都是企圖着消除國際互相壓迫的關係，建立全世界協力的關係，這是在把一個國家以內的革命發展到整個的世界來應用了。在一個國家內實行革命，一個國家內的組織尚須有澈底的改變，世界要實行革命，世界的組織當然更需要澈底改造了。否則口頭上空號召，不在組織上求改變，便於事實絲毫無補。非戰運動者的「哭嚷」終究敵不過驚心動魄的砲聲，也不會減輕一點國際間的壓迫關係。

要實行世界革命，便要改變世界組織。但所謂改變組織，多頭的國際平衡主義沒有用，像歐洲的國際聯盟那樣，大不了被幾個大國操縱利用着；取消國家的無政府主義也沒有用，像莫斯科的第三國際，他們不用協力主義來聯合世界，却用階級壓迫去煽動世界，結果第三國際變成了蘇聯的別名，不能超出蘇聯一步。現在又有所謂「超帝國主義」，我們尚不確實知道這個超帝國主義是什麼東

西。假如超帝國主義像中國所說的蠶一樣，是王中之王，是毒中之毒，那就荒唐透了，世界可以給人類建築樂園，但絕不能給野心的惡魔拿去作煉蠶的瓦盆。如帝國主義者果真瘋狂着作第二次的大戰以鍛煉蠶樣的超帝國主義，那末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將競起作「自決」的鬥爭，非但超帝國主義不得出頭，就是那些平凡的帝國主義也一例被推倒了。

超帝國主義或還可以再尋出一種解釋，那便是集幾個帝國主義結合成一個超然的大帝國主義，由這個超帝國主義去統一世界。但是，這是更大更空的夢想了，「神聖同盟」的德奧俄三大帝國的覆轍早放在世人的眼前。現代的人類堅信着協力主義的結合，武力的強暴的壓迫已不能再容忍了。非但殖民地的被壓迫民衆不能容忍，就是帝國主義自身的民衆也不甘作無謂的犧牲，而會斷然起來反抗，爆發十月革命的舊俄帝國是個榜樣。現在日本帝國主義也在跟舊俄學樣，侵佔了中國的東北，還想進一步聯盟英法向美俄挑戰。日本軍閥是氣可吞象，但我們不要爲日本軍閥瘋狂的自誇所迷惑，只要中國民衆的堅持反抗，就已致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死命。日本民衆在贖武主義的鞭策下，他們遲早要傾向於革命而同情於中國起來推翻帝政，打倒軍閥。以一個剛剛經過大革命破壞後的中國便能致未來「超帝國主義」的日本的死命，那末在全世界革命民衆與被壓迫民族的共同奮鬥下，我們就可以知道超帝國主義是怎樣脆弱的東西了。

多頭的國際平衡主義不能統一世界，取消國家的無政府主義不能統一世界，迷信武力的超帝

國主義也不能統一世界，那末怎樣才能統一世界，實現和平呢？當然只有依據協力主義的原則，在全世界人類共同生活的利益中，擴大人類的組織，實行「民族自決」，成立革命民衆與被壓迫民族聯合的世界的國家組織，發展民族的國家，爲世界的國家，世界統一，人類的壓迫關係消除，戰爭也隨着消滅，世界便和平了。

四 和平的世界

和平的統一的世界是絕對可以實現的，決不能認爲是孫中山列寧的空想也，決不是法西斯蒂的幻夢！和平是全世界人類的責任，任何的人都須極端虛心而奮鬥努力，不應稍存着野心或者偏見來窺視和平。誰要想包辦和平，誰要存着偏見忽視現實，這都是和平的罪人。

威爾遜總統的「民族自決」主義，孫中山先生的「大同主義」，列寧的「世界主義」，法西斯蒂的「國際民族主義」……這些都是世界和平的支柱，但世界和平的主人是全世界的人民，我們只有幫助全世界的人民實現和平。譬如中，俄，美，意，德，印度之間，牠們在國際間的出路是共同的，但政治上的偏見却常常妨礙了牠們共同的努力，中俄的國交最近總算恢復了，美國却至今還沒有承認蘇俄，凡這種種的爭執，在整個的世界和平運動的意義上說，實在是無謂的浪費！世界需要改變，世界便需要革命；革命是爲了全世界，革命是爲了全人類，革命並不是爲了一個民族或一個政黨，那末爲

了和平，爲了世界，政治上的偏見當然是應該放棄的啊！

關於怎樣實現和平世界，我想留待下篇「實際」中去討論。現在在理論方面還要解釋的問題，便是世界實行統一以後，世界實現和平以後，這種種和平與統一是否有永久的保障？是否有鞏固的基礎？本來，將來的問題將來自然會有辦法，現在的科學祇能解決現在的問題。不過在我們有能力預先估定的地方，我們就預先估定一下，也不會是自費。

世界實現和平統一以後，在一些帝國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的說辭中，他們也許可以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各民族有民各族的個性，政治上不能統一；第二人口繁殖與生活資料的限制，和平不能永久維持。

第一個的民族性不能統一，這問題現在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了。現在世界各國除了極小的小國以外大都是由許多個民族構成的。英法日等國雖是以少數民族統治多數民族，以民族壓迫關係而成立國家，（事實上印度安南朝鮮現在已經開始動搖了。）但中國和蘇俄，牠們都是由許多複雜的民族本着民族自決的原則集合起來的。成立全世界統一的國家，因爲人類協力的範圍擴大，一切的民衆都只有利益而毫無損害，更與所謂民族的個性不發生衝突。也許與少數野心軍閥帝皇政客發生衝突，世界的國家出現，他們必須取消對於本國民衆的佔有慾和支配慾，而打破了殘酷的剝削的關門統治。可是這祇是犧牲了現存統治者的不正當的利益，對於人民，對於民族，却是有益無損的啊！

世界政治的統一是有問題的，在近代科學的影響下各民族的社會意識都含有統一性的基礎，現有各國家的立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儘可在協力主義的原則下逐漸變換而統一起來。那些偏狹的國家主義者和憤世的無政府主義者擔心世界統一會與民族個性發生衝突，實在是杞人憂天！

關於第二個人口繁殖與生活資料的限制問題，從來我們就沒有看見過什麼正當的理由，好在帝國主義者的飛機大砲兵艦向殖民地大批的開出去，牠們有武力，牠們可以放縱着自己的獸慾，原用不着申明理由。不過牠們在每一次從事戰爭或擴充軍備的時候，牠們須向本國的奴隸（民衆）徵發生命和財產，便要拿出一點欺騙的說辭，這說辭便是開拓殖民地，解決本國的人口過庶的問題。這問題的唯一根據便是陳腐的不合實際的馬爾薩斯的人口論。

馬爾薩斯說人口與生活資料的增加，一個是幾何級數的，一個是數學級數的，生活資料順着一、二、三、四、五、六、……增加，而人口却順着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增加，於是人類永遠感着生活資料的缺乏，結果是貧困，犯罪，疾病，戰爭，……一切的黑暗都充滿着社會了。可是，這是事實嗎？歷史上，人類由依靠「茹毛飲血」的動物的生活資料進步到發現家畜發明種植，這時的生活資料是增加了幾倍呢？又如礦物的開採和提鍊，節省了大批的植物的消耗如燃料顏料以及製造日常用具等類，這時的生活資料又是增加了幾倍呢？假如我們注意到真實的事實，注意到人類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的

進步，我們反會相信人口的繁殖遠遠不如生活資料的增加來得快啊！我們知道現代科學國家一個最下級的人民所消耗的東西要比原始時代一百個人所消耗的還要多，這種消耗的增加難道不是人類自己生產出來的，而是天上掉下來的嗎？

原始人類的戰爭的確是爲了爭奪生活資料，但中古代以後的戰爭則可說完全是爲了少數人的尊榮，而近代的戰爭却是爲了爭奪市場，因爲生活資料太多了。目前的世界除了科學幼稚的國家以外，沒有一個國家不在憂愁存貨太多，拚命要覓取市場，爲了要把多餘的生活資料銷送出去，甚至不惜流血，不惜戰爭，把成千成萬的生命和財產投入砲火裏去，這難道也是馬爾薩斯定律中人類所不可避免的災難嗎？

人類能有那樣的犧牲的決心去從事戰爭，從事破壞，人類爲什麼不可以轉變方向去從事建設，從事改造地球呢？一九一四年開始的世界大戰，死傷的人民有三千萬，而耗費的財產則有四五千萬，我們如把這鉅大的可驚的數目去改造地球，我們可以建築幾條環繞地球的鐵道，可以把許多大沙漠改造成沃土，可以把冰港改變成暖流，甚至還可以在大西洋太平洋上架設大鐵橋。我們不要以爲這些改造地球的事業是夢想，我們應當知道把二三千萬的人命一旦投諸死地，驟然聽到，也會覺得是夢想。那些萬惡的魔鬼——皇帝！軍閥！官僚！——盡着畢生的成羣的心力，吸盡了全國的人力與財力，在那裏十年二十年的無期的佈置着籌備着，最後才一聲戰炮，幾千萬的人民化成灰，幾千萬

萬的財產變成火，於是世界民衆的大災難實現了，而魔鬼們的獸慾也發洩得暢快了！

改造地球是人們所歡喜做的事情，戰爭却任何人都要感覺到痛苦，如果我們認為改造地球是合乎人情的而戰爭是不合人情，那末我們還可以相信改造地球的工作比戰爭的工作將實現得更順利，更迅速，只要世人也具有戰爭那樣的決心就好了！

地球是公的，地球上的發展是永無窮期的，人類只要統一了世界的組織，把自相壓迫的舊觀念改變爲人類互相協力的新觀念，人類自然可以有力量改造地球，甚至可以力量改造宇宙！現在的地球容納十六萬萬人，魔鬼們已經怕人多，要用砲火毒瓦斯來大批轟殺掃滅，未來的地球像花園一樣將容納二百萬萬人二千萬萬人還會覺得寬大。我們現在的十六萬萬人過着火煎地獄的生活，未來的二百萬萬人二千萬萬人反是生長在樂園裏呢！（下期續完）

獨裁與革命

S
W

一 獨裁的社會基礎

人類如都像高等動物下等動物那樣，各自過着獨立生活，意識上不互相聯繫，生活上不互相協力，那原沒有什麼，猿猴永久是猿猴，昆蟲永久是昆蟲，人類永久是人類好了。但人類終究不能像昆蟲猿猴那樣永久受自然界的支配和決定，過着「歷史的循環」的生活，人類要順着歷史向前進步。千萬年前昆蟲猿猴的祖先過怎樣的生活，千百萬年後昆蟲猿猴的子女也是過怎樣的生活，牠們除了死死生，生生死死的自然現象以外，是沒有歷史的。人類就完全不同，原始人類與部落社會的人類不同，部落社會的人類與古代國家的人類不同，古代國家的人類與現代科學的人類也不同。所以人類是進化的動物，人類能夠創造自己的歷史。

(31)

人類的能夠進化，並不是由於上帝的意旨，也不是有什麼特具的「心」和「神」，只是由於生理上的構造不同，意識特別敏銳發達，能夠互相團結，能夠過共同的協力生活，於是人類成立了人類所獨有的社會。社會是人類的羣集而具有組織性的集團，社會存在於自然，但成功於人力。社會不能

像蘋果橘子那樣從自然的菓樹上生長出來，須在人類意識發達的過程中逐漸成立。

社會是自然界中一種具有力的實體，沒有力的社會是不能存留的。這個所謂力，不是上帝，不是神，也不是心，而是個人意識經過組織和鍛鍊出來的「社會意識」。換句話說就是「信仰」。孫中山列甯是社會的先知先覺，孫中山列甯的思想和意識便成爲社會的思想和意識。俄國人信仰列甯產生了俄國社會的力，中國人信仰孫中山便產生了中國社會的力，俄國中國因爲有了這兩個新的社會力量，所以俄國中國都能夠革命，解除了人民的痛苦，而社會也都顯出了新的形態。

講到信仰，講到社會的力，在意義上是團結，是協力，在行動上便是專政，便是獨裁。尤其革命的行動，要從舊社會中改造出新社會，不用斷然的迅快的手段，革命勢力往往會被反動勢力催毀無餘。在新與舊的戰爭中，若不集中信仰，實行獨裁，革命便只是無謂的流血，無價值的犧牲而已。

社會上就是小到三個人的團結，三個人的協力也免不了要獨裁。譬如甲，乙，丙三人遇到現實的事情，三個人或兩個人的同意固然要做，否則一個人的意旨也是要做的。縱使乙和丙放棄責任或者各持異議，但甲能在正義的立場上實行獨裁，把現實應付過去，對於社會仍是非常光明。三個人的團結已需要獨裁，推廣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就更多意雜，如沒有一個嚴密的組織，執行堅毅的獨裁，便會「道勞架舍」，一無成就，結果不被別的民族所淘汰，必爲別的國家所滅亡。

社會愈進步，組織愈完密，便愈需要獨裁。不論是政治抑是經濟，離了組織，離了獨裁，都一步不能

行動。社會如一個人一樣，每個個人都只是社會的一個細胞，人體的細胞受一個腦的指揮，社會的細胞便受一個『社會的信仰』的指揮。所以獨裁的理論不單在社會的人力論方面有牠的基礎，就在生理的自然論方面也自有牠的基礎。

二 蘇俄革命與意大利革命

獨裁未必都是革命，但革命是一定要獨裁的。革命雖了獨裁，雖了專政，革命便永遠是鏡花水月，給大家看看而不得實現。革命不單是理論，更重要的是行動。但革命的行動不是個人的行動而是社會的行動。個人的行動，利害關係簡單，個人要做就去做了。社會的行動，利害關係複雜，一件事發生，往往甲要做而乙反對，丙要做而丁反對，『權利則信信以爭，義務則望望以去』（陳英士致黃克強書）那末雖然是於社會有利的事情，却也不容易成功。

要社會的事情實現得和個人的事情一樣地容易成功，便須有最勇敢最正確而最堅決的『先知先覺』把社會的事情當做他個人的事情去幹。把社會的事情當做個人的事情去幹，實際上是爲了革命，爲了社會，但表面上很容易被人看爲個人獨裁，好像個人在自作威福。其實獨裁是義務，不是權利，在鎮壓反動的時候，在執行遠大計畫的時候，一個領袖爲了社會的利益，爲了革命的利益，便必須堅決貫徹他的主張。在理論上領導革命的須有煽動的口才，在行動上領導革命的便必須有鋼鐵

的手腕。否則任你怎樣圓妙的理想，理想自己並不能變成事實！

獨裁這個名詞，在中國好像是種恥辱的代表，但在世界，獨裁却並不為人所厭棄！我們就請考察蘇俄的革命和意大利的革命吧。

蘇俄的革命是先有個列寧的理想深印在俄國人的腦際，然後才有列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的堅毅的成功。意大利的革命却和蘇俄完全不同，意大利的革命事前並沒有什麼偉大的理想，只是莫索里尼把意大利的事業當作他自己的個人事業，運用他的鐵腕把意大利拯救起來了。在理論上，蘇俄革命和意大利革命可說是兩個絕不相同的東西，蘇俄的理論裝飾得很漂亮很圓妙，莫索里尼却祇承認事實，不承認理論。但在行動上在責任上，他們同樣都實行獨裁實行專政，列寧把蘇俄的事業當作個人的事業，莫索里尼也把意大利的事業當作個人的事業。所以在這裏，我們可以很明白的說，革命的理論可以各各不同，但革命的需要獨裁却完全一致。

列寧主義的獨裁，法西斯蒂的獨裁，本與古代的家長，族長，酋長，君長的獨裁毫無差別。所不同的，就是古代的家長，族長，酋長，君長的獨裁是一種權利，而列寧主義的獨裁和法西斯蒂的獨裁乃是一種義務，或是一種責任。古代的獨裁不是「受命於天」，便是「出於上帝的意旨」，因為「天」和「上帝」把獨裁的權力賦於一個人，這個人便有無限威福，可以為所欲為，甚至犧牲民衆的利益也可以不受阻礙。現代的獨裁却不是「受命於天」，也不是「出於上帝的意旨」，而是由於社會的需要。社

會需要革命，一種堅決的革命行動便自然而然的實現了。

一九一四年的歐洲大戰結束後，歐洲各國爆發革命的很多，但能夠保持着得到最後勝利的就只有蘇俄和意大利兩國。這就因為蘇俄和意大利有負責的領袖，能實行專政，實行獨裁，以生命與熱血去保證革命的勝利。別的國家雖然爆發了革命，但參加革命的人都是偶然的利害的結合，不能集中信仰，不能迅速行動，不能實行獨裁，結果革命雖然發生了，却絲毫沒有保障，每次的革命和暴動，都成了無價值的犧牲流血！

革命需要獨裁，革命需要專政，這不是理想的問題，而是事實的問題。理想上，獨裁與專政不是幸福，但事實上革命不經過獨裁，不經過專政，革命便一天都不能存在。革命必須擁護一個領袖的革命，更必須服從一個領袖的獨裁！我們明白了蘇俄和意大利革命的歷史，我們認識了斯大林和莫索里尼的革命的鐵腕，我們難道還不知道無理由的反獨裁是等於保守派的反革命嗎？

三 中國革命的獨裁基礎

中國革命自民國十六年統一全國，到現在已經六年了。革命成功，全國人民都可出水火而登衽席了。但不幸的，就是全國不能集中信仰，不能實行獨裁，先有國共之爭，接着更有歷年內部的分裂，以致黨有專政之名而無專政之實。

本來革命只有路線正確不正確的問題，絕對沒有獨裁不獨裁的問題。路線正確，獨裁可以使事情實現得快些，路線不正確，用不着反對，他自己先就倒台，就是想獨裁也獨裁不起來。我們不看見那些勇於做反獨裁運動的中國領袖，登了台，他們不也一樣在希望獨裁嗎？

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放逐出國，托洛茨基只是始終忠實於自己的政治主張，從來沒有想到要反對斯大林獨裁。中國領袖就完全不同，反獨裁成了獵官的工具，誰要想做官，只要去反對獨裁就好了。一般領袖只想在權利方面實行分贓，你不允許，他就要反對你獨裁。其實革命只需要獨裁而不需要分贓，托洛茨基曾指出斯大林五年計畫什麼什麼的不對，從沒有像中國領袖的毫無理解，反對斯大林獨裁從路線上從政策上作批評的是革命，從地位上從資格上反對獨裁的只是想分贓而已。革命與反革命，分贓與獨裁，這中間我們應該有深刻的認識！負起革命的責任，以獨裁的精神執行革命的任務，這正是民衆所要求的！

執行三民主義的任務，現在遇着若干困難也並不是怎樣奇怪的事，就是在孫中山先生生存的當時，也常常同樣的遇到困難：

「於民國建元之初，予則極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實行三民主義。而吾黨之士，多期期以爲不可。經予曉諭再三，辯論再四，卒無成效。莫不以爲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也。嗚呼！

上面這一段沈痛的話，是孫中山先生在行易知難中說出的。這裏很明白的表示出革命不獨裁，許多良好的時機都被遺誤過去了。革命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的，但因循苟且，坐誤時機，這却是莫大的罪惡！孫中山先生鑒於過去的缺憾，後來終於建設了『行易知難』的學說，要國人集中信仰，堅決執行革命的任務了。所以孫中山先生後來在廣東長期的艱苦奮鬥，雖然他仍要用偉大的精神向黨員及民衆『曉諭再三，辯論再四』，但在許多緊要關頭，爲保全革命的利益，終於取採了種種斷然的佈置。

孫中山先生創立行易知難的學說，正是爲革命創立獨裁的理論的基礎。不幸孫中山先生因革命的勞瘁而與中國長辭了，黨內共信共立的基礎太薄弱，信仰不能集中，獨裁的基礎便又根本動搖了。雖然有一二信仰較堅力量較強的領袖，忠實於革命，忠實於孫中山先生，遇着現實需要的時候做出堅決的革命行動，一些元老巨勳又便立刻依着自己的資格和地位出來反對獨裁了。

其實中國革命有中國革命的理想，中國革命的理想便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實業計畫，和錢幣革命。執行孫中山先生的理想的便是革命，不執行孫中山先生的理想的便是不革命。中國如有鋼鐵一樣的領袖，他用鋼鐵一樣的手腕，鏟除反動勢力，他用鋼鐵一樣的手腕，執行孫中山先生的理想，他用鋼鐵一樣的手腕，建立革命的新中國，這樣的領袖我們正是求之不得，這樣的領袖我們應當用熱血去擁護！我們不需要昏庸老朽的領袖，我們不需要土神木偶的領袖，我們不需要滑頭騙客的

領袖，我們所需要的領袖是鐵和血，是忠實於三民主義的獨裁的領袖！

德國政權歸希特勒

胡伏生

霹靂一聲，德國政權歸希特勒了！

世界自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開始以來，便如在沸湯中動盪不已，而德國却正做了這動盪的中心。德國自大戰結束，殖民地喪失淨盡，交通及生產要具不被沒收便被破壞，又加以鉅額賠款的負擔，所唯一藉以掙扎度日的是以科學先進國的地位，可以從出口貨和各種國際新借款方面設法補償。不幸世界經濟恐慌一瀰漫起來，各國爭築關稅壁壘，並以絕大犧牲精神努力傾銷戰爭，這在英美法荷等戰勝國還可以勉強維持，在戰敗的德國可就受不了了。——當然，德國與英美法荷之間只有程度上的差別，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如果德國一旦崩潰破滅，其餘的自由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法荷也要隨着破滅的。所以去年的洛桑賠款會議，各協約國對德國的讓步，表面上似乎爲了德國，實際上是爲了他們自己。

賠款問題解決了，但德國的問題却還多着，失業問題，財政問題，這些都必須立刻解決，但又是無

法解決的。賠款問題因爲協約各國對着一堆乾石子榨不出油水，在自由資本主義國際利害相同的關係上尙可對德政府作不得已的讓步，然而民衆對於國家，民衆在挨餓而無法生存的時候，却不會有何原諒的餘地。德國最近兩年來溫和派的社會民主黨逐漸失勢，極端派的國家社會黨與共產黨却猛烈發展，這可證明德國人民的忍耐力已到了最後的一步了。

當一個國家的矛盾和動亂的現象已成爲事實的時候，這個國家便非有一個激烈的變革不可。不經過一個澈底的變革，矛盾不能消滅，動亂不能平服，國家的秩序便也無法穩定。所謂社會變革的現象，在中國古代——歐洲古代恐怕也是如此——便是一次一次的大混亂，人民普遍地遭受着屠戮，等到「人心厭亂」了，才再循環回復到『太平世界』。現在人類思想進步，知道「太平」並不一定要從「屠戮」中去求，而要從改革社會制度中去求，於是歷史上循環不已的混亂和屠戮，現在便變成革命了。馬克斯派的先生們解釋革命，總要用辨證法來兜一個圈子。其實循環的屠戮是辨證法，前進的革命也合於辨證法，「循環」是宇宙自然的現象，「前進」却是人類意志的表演，與辨證法毫無關係。

德國矛盾和動亂的事實已經出現了，當然應即依着積極民衆的意志作前進的改革社會制度的表演，但深印德國人民腦際的馬克斯學說加重了德國的困難。馬克斯的學說因有赫格爾辨證法的炫耀，愈顯出牠的神祕性和奧妙性，而科學的德國人民正有這種祕奧的嗜好，於是在這世界恐慌期中，馬克斯的學說就發酵得更利害了。在國會中向爲第一黨的社會民主黨最近兩年來退處第二

位，後起的國家社會黨躍居第一位，共產黨的議席亦突然增加。「黃色」落伍了，代之而起的是有暴烈性的「赤血」，非但德國需要赤血，就是全世界也需要赤血。德國社會黨與共產黨本來同是德國的赤血團結，同是變革時代必需的熱情組織，但共產黨在思想上爲馬克斯的機械論和宿命論拘禁着，行動上竟做了理想的奴隸，共產黨的兇惡的面貌，動亂的表情，表面上似乎帶着濃厚的破壞的氣息，幼稚的人們都認破壞就是革命，可是一味的破壞並不能幫助德國，只是加重德國的困難罷了。

德國是困難的，但黃色的調和沒有用，共產黨的理想也沒有用。這時期，只有智慧，毅力，熱血和組織，這樣就只有希特勒，就只有希特勒和他所領導的國家社會黨能夠拯救德國了。德國的政權將歸希特勒掌執，早已在我們意料之中。過去因爲興登堡的固執和希特勒的堅持，巴本倒後，乃有施萊赫爾軍人內閣。經過施萊赫爾軍人內閣六十餘日的掙扎，興登堡終於覺悟到總統和軍人的權力不可靠，希特勒也覺悟到國家的危難，於是希特勒的內閣實現了。

二

去年十一月間，德國會改選，國家社會黨的議席由二二九席減少到一九六席，中國許多政治預言家便衆口一辭的狂喊德國的希特勒黨已成了「強弩之末」，將要沒落了。當時我們雖也以巴本倒後，希特勒不應拒絕組閣，（現在施萊赫爾倒，興登堡還是向希特勒屈伏，這證明去年的拒絕並沒

有錯誤！使德國的法西斯運動遭受損失，但我們絕對不承認在國會中的減少議席便是國家社會黨的沒落。國會中各黨議席的忽漲忽落，只是民衆政治感情的變遷，並不是什麼政策經過試驗的失敗。

我們要討論國家社會黨的成敗，不能機械地根據一片一段的事情來下判斷，必須先認清國家社會黨發展的歷史。原來在二年以前，國家社會黨還遠不如共產黨社會民主黨等的有歷史和理論，一切都只憑着希特勒的智慧和毅力從荆棘中創造出來，直至一九三〇年在國會中還只有十二位議席。可是就在這年繆勒內閣去職，白魯寧登台，於七月十八日解散國會，九月十四日總選舉的結果，國家社會黨的議席突然增加到一百另七人。從來不經人注意的國家社會黨，到這時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等到巴本內閣第一次解散國會，改選結果，又由一百另七增至二百二十九，躍登第一位，使國會原來的陣勢根本推翻了。德國國會的陣勢既根本起了變化，照例德國的政局也應當隨着轉變的，但固執的興登堡竟不顧民衆的政治傾向，他迷信着總統的權力，又迷信着軍人迪克推多，先則依重巴本，接着又依重施萊赫，但沒有民意基礎的內閣終於不能維持政局，最後還不得不讓希特勒出頭。所以興登堡的授權希特勒，並非興登堡的誠意，不過爲現實所逼迫罷了。

國家社會黨在國會中的議席升降，我們可從下列的簡單的計數作一個對照：

年月

席數

增減

一九三〇年 一二人

一九三〇年九月 一〇七人 增九五八

一九三二年七月 二二九人 增一二二人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一九六八 減三三八

照一般淺見者流的見地，希特勒黨的議席既從十二人進至二二九人，似乎更應該從二二九人進而佔有議席的大半數，甚至造成清一色的的國會。但這是夢想！中國的一些政治預言家乃以自己的夢想去壓倒希特勒，看見希特勒減少了議席，便大喊國家社會黨沒落了，希特勒已成了「強弩之末」了。殊不知希特勒黨接連有了兩次的猛進，議席由十二驟增為二百二十九，第三次因為急切不能使民衆滿意的政績，遭受挫折實是很平常的。何況去年十一月間國家社會黨的減少議席，並不完全由於主觀條件，還有更重要的客觀原因：

第一，人民對於選舉已遠不如從前的興奮，選票由三六八四五二七九降至三五四〇二三〇六，只佔總選民的百分之八一·五（上次為百分之八三·二）總議席由六〇八減為五八二。因為這影響，國家社會黨的議席事實上不得不減少。

第二，因競選關係，國家社會黨頗受政府及共產黨的壓迫，政府黨的中央黨與人民黨隨着優勢擴張勢力，於是前二屆猛烈發展的國家社會黨，這一屆便不得不相當讓步，顯示低落。

明白上述的原因，那末國家社會黨減少百分之十五的議席，就絲毫不值得驚異。

希氏就任總理後，因與中央黨談判決裂，已於二月一日下令解散衆院，於三月五日舉行改選。在三月五日的總選以前，我們預料希特勒將佔有極大的勝利，結果不出所料。歷來白魯寧巴本等內閣也曾解散過衆院，但都沒有能夠成功。白魯寧巴本企圖實行迪克推多，可是沒有社會的基礎，沒有民衆的信仰，結果在新國會中仍舊不能獲得多數。希特勒則完全不同，他有現實的理論，有堅毅的組織，有犧牲的精神，更佔著『政府黨』的優勢，改選當然可操勝算了。

希特勒巴本白魯寧的解散國會，重行改選，表面上同是『將內閣的政見，直接取決於人民』的一個口號。但實際上，巴本白魯寧不過靠着總統與登堡的權威，作一次投機的嘗試罷了。他們把內閣的命運好像賭博一樣的去碰碰運氣。萬一改選勝利了，他們又可以繼續『戀棧』下去。希特勒在理論上自有其光明的前途，在政治上也有其現實的基礎，他的提出『改選』，他的『直接取決於人民』不祇是希氏個人在政治行動上的要求，而是德國在事實上所必需的行動。否則德國的政治難道可以長此腐潰混亂下去嗎？

德國國家社會黨是代表全德意志唯一的多數黨，牠所領導的選民有一一七—一三七八五票，佔參加選舉民衆總數百分之三三·一，爲國內任何政黨都不能追及。現在巴本和興登堡終於屈服了，希特勒一方得有實際施政加深民衆信仰的機會，一方又得有政府黨的優越地位從事競選，所以在

三月五日的選舉中國家社會黨由比較上的第一多數黨擴大為國會中絕對的多數黨，事實是可能的。萬一國家社會黨獲得議席仍不足以支配國會，那末我們相信希特勒必將本着拯救德國的精神，仿照中國的國民黨，俄國的共產黨和意大利的法西斯黨，而實行國家社會黨的一黨專政。

一黨專政現在已成爲彌漫世界的潮流，也惟有一黨專政能救治目前紛亂如麻的潰爛出蛆的虛偽的德謨克拉西！中國現在正有一些在學院中發狂的政治家，他們矚視專政，以爲專政是反「民主」的。其實希特勒受了德國多數人民的「委託」而以大無畏的精神來執行專政，執行獨裁！民衆信任專政，現實的政治環境需要獨裁，自不必顧慮於少數「民主」騙子的叫囂而放棄自身的使命！

中國革命怎樣進行

李 寧

引 言

「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這是革命的格言，也是革命的定律。合乎理論的行動是前進，革命，背乎理論的行動便是後退，反動。二十餘年來的中國隨着理論的顯耀與汨沒，時而前進，革命，時而後退，反動，在歷史的軌道上走盡了「前進一步後退兩步」的冤枉路，結果革命沒有給與民衆什麼東西，却招來了不堪的混亂與黑暗！領袖們未上台，未握到政權，往往愛高談理論，痛惜民衆，但一上了台，握得了政權，便「爲政不在多言」，於不知不覺間默默地幹後退反動的勾當了。

一八九四年孫中山氏創立興中會，鼓吹民族革命，這是中國革命在理論上的起點；一九一一年南京成立臨時政府，這是中國革命由理論進於現實的開始。可是辛亥革命的成績，祇推倒了國際帝國主義（？）足下的一個御用機關——滿清政府，對內沒有消滅社會矛盾，對外沒有得到民族自由，革命的基本任務仍是原封未動。但一般放棄了「入股」來投奔革命的人物，便以推倒滿清政府爲滿足，又去投奔袁世凱，投奔黎元洪，投奔曹錕，甚至投奔大大小小的軍閥，政府很快的回復了滿清

政府的反動性，同樣的做帝國主義的御用機關，同樣的壓迫民衆反對革命，所不同的只是滿人換了漢人。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北伐成功，中國國民黨統一中國，這是孫中山氏的革命理論第二次進於現實的境界了。這時三民主義的理論已普及全國，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北伐的成功形式上雖由於軍隊，實際上却是由於人民的援助。這時期，一步一步都在展開孫中山的主張，如漢口英租界的收回，政府確實由帝國主義的御用機關變爲自主自治的民族國家機關了。不幸寧漢由內部糾紛發生以後，雙方從事於實力的較量，理論成了武力的點綴品，於是理論又來了一個汨沒時期，在不明顯的狀態中，各個軍閥實行割據，中國革命再走入「前進一步後退兩步」的軌道上了。

激烈的內爭的結果，終於釀成了二十年九一八暴日侵佔東三省，二十一年一二八轟炸上海，和今年侵略熱河的慘禍。這慘禍的發生，不論在物質方面在主權方面都是民族莫大的損失。中國在這巨大的犧牲之下所得的可貴的代價，便是「前進一步後退兩步」的歷史現象將在這教訓下有結束的機會，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在去年十一月七日發表的談話中說：

「當去年九月，瀋變突作時，余曾預言，內戰時代，行將告終。往日軍人間倘發生武裝爭執，中央當下嚴令移軍往討。今則政府深知武力統一既難，集事又非所宜，故欲施行道義之制裁，藉輿論之助力，解決地方爭執。」

「武力統一」是軍人的迷夢，同時也是革命的絕大犧牲，內戰的結果縱使不根本推翻革命，然而延長了革命的破壞時期是不可諱言的。現在宋氏代表政府，聲言「藉輿論之助力，解決地方——當然連其他一切革命的糾紛都在內——爭執」這顯然是中國革命又推進一個新的階段了。如果我們確定辛亥革命爲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十六年北伐勝利爲第二階段，那末九一八以後便應該轉入第三階段，這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便是中國革命努力於社會建設的開始。在這一時期，武力已不是政爭的工具，誰最有能力建設中國，誰便能在政治上爭得勝利！換句話說，就是誰最能承繼中山的革命理論和革命精神來建設中國，誰便能取得勝利，統一中國。

當然，繼承孫中山氏的理論，決不單在於形式上的尊崇，也不單在於斷章取義的鈔錄，而要在實際上運用，使理論的三民主義進於現實的三民主義。我們如果虛心檢查一下過去的事實，北伐後的中國除在政治上軍事上有若干形式的改變，經濟上財政上什九還是在摹仿自由資本主義的神髓，民生問題不得解決，民族資本不得發展，國內產業愈趨愈衰落，社會秩序也愈趨愈混亂了。擔負着中國革命的重任的國民黨，如只想倚恃現有武備和既成勢力來維持統治，勉強圖存，那就算了。如果我們要想求得和平的統治，對內雖撤廢了一切的武備而能不動搖統治的基礎，這種光榮的統治，就必須在孫中山主義中去尋覓。

革命的「前進一步後退兩步」的時代過去了，我們將怎樣利用這機會來展開中國革命的新

道路呢？我們試依着孫中山氏的理論，適應着現實環境，分開經濟，軍事，政治，外交的四個主題來討論吧：一、發展民族資本，二、培植民衆的武力，三、澄清政治，四、確立正義與和平的外交政策。

一 發展民族資本

在世界帝國資本主義的控制下，前年海關入超達六萬萬兩，輸入品除工業品外，農產品亦佔主要的成份，這證明中國經濟的衰落已到頂點了。在這現象下，革命急要的任务自然是挽救衰落的社會經濟，挽救倒懸的民生問題。挽救的方法，國內的者早已在討論，或則在實際努力作種種解除民衆痛苦的運動了。不過在各種實際運動和理論當中，我們認爲「發展中國民族資本」是一條切實而正確的辦法。至於發展民族資本的方法，在孫中山氏的遺教中早已有明白的規定了。從「錢幣革命」的短文以至於「實業計劃」的偉著，這都是發展中國民族資本最有利最穩妥的捷徑。也許有一些左傾幼稚的同志們不了解孫中山氏理論的偉大，嘲笑走「捷徑」的革命，可是事實最雄辯，等到把自由資本主義的方法和共產主義的方法摹仿到了無可再摹仿的時候，我想這許多在行動上在口頭上評議孫中山氏的同志們總有回頭的一天吧。

在目前談發展民族資本，首先應當顧慮到的：第一，國際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壟斷，第二，不平等條約的存在，前者使中國民族資本窒息於世界金融潮流之下不得活動，後者則使中國關稅不能自

主產業無從發展。第三，資本短少，產業運用不能活潑。第四，農村經濟受封建力限制，生產不容易擴大。綜上四項困難，我們如迂迴曲折地在共產主義或自由資本主義的理論下求解決，那是絕對走不通。如實行孫中山氏錢幣革命的主張，走列寧「社會——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那就一切困難都沒有了。

社會資本主義的理論早已具備於全部孫中山氏的遺著中，列寧在蘇俄共產主義經濟發生嚴重的危機以後纔施之於現實，現在蘇俄計劃經濟着着實現，差不多完全成功了。錢幣革命這個名詞雖沒有被蘇俄革命領袖和經濟學者所口頭引用，但實際上也早已運用無餘。蘇俄由自由資本主義的銀行改變為社會資本主義的銀行，使金融組織根本改善而得了長足的進步，這正是孫中山氏錢幣革命在實際上的活潑應用。

中國實行錢幣革命，當然不能機械地摹仿蘇俄共產主義的方法，也不能像最近在南京成立的「中華錢幣革命協進會」那樣的摹仿自由資本主義。共產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都站在階級鬥爭的基礎上，孫中山氏的三民主義和社會資本主義則站在階級協力的立場上。錢幣革命，在階級協力的立場上當然與在階級鬥爭的立場上完全不同的。

錢幣革命的實行，依照孫中山氏的理論系統，第一是確定錢幣制度，確定錢幣的「交換之中準」或「貨財之代表」的地位，第二便是鞏固金融基礎，擴大銀行組織，使錢幣得以健全地發揮出「經

濟紐帶」的作用。(限於篇幅，詳細解釋當另作專文。)中國經濟得有這個順利的流動工具，發展民族資本的困難就都解除了。譬如(一)國際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壟斷，因為錢幣革命後生產資本已不受金銀的拘束，國際的金元與金磅便不能再在幕後操縱。譬如(二)不平等條約，因為錢幣革命後產業發展，失業減少，國內市場無形擴大，同時輸出品成本減低，不平等條約的拘束亦已減少效率，各資本主義國家要想獲得產業革命後的中國市場，改正或放棄不平等條約也是必不可免的步驟。在產業沒有發達以前談取消不平等條約實是句空話，在產業發達以後談取消不平等條約，有事實做基礎，那是很容易的。譬如(三)資本短少，因為錢幣革命後國內的金銀和紫銅等都不需要，得有大宗的資本向外國購買機器和原料，國內則有健全的金融制度和銀行組織運用「信用貨幣制度」，資本短少的話決不成問題的。譬如(四)農村經濟受封建力限制生產不容易擴大，錢幣革命後因為有了雄厚的生產資本和嚴密的金融組織作後盾，生產工具與生產技術的改良都不是煩難的事，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也不能再繼續存在，那末殘餘的封建勢力也是不成問題了。

實行錢幣革命，實行社會資本主義，一方面開拓了中國革命和平發展的平坦大道，消除了發展民族資本的一切障礙和困難，一方面還有更偉大的作用，那便是實行錢幣革命後，社會經濟可以永遠不發生「恐慌」，在社會資本主義的基礎上，不問社會進化到如何程度，也不會發生階級鬥爭和貧富矛盾。

二 培植民衆的武力

一派迷信武力萬能的人總想依賴槍桿子革命，結果歷次的內戰老百姓先遭殃，打來打去革命還是毫無辦法。擁護小軍閥來打倒大軍閥，政客們或可從中取利，升官發財，對於革命對於民衆實在沒有絲毫的利益。大軍閥不革命，小軍閥又何嘗能革命？試觀歷來中國的內戰，政客們拚命在幕後搖旗吶喊，佈置陣線，把小軍閥贊美得孫中山再世，列甯復活，但等戰爭結束，小軍閥上台，還不是「天下

的烏鴉一樣黑」，「一蟹不如一蟹」嗎？凡有政治常識的軍事領袖，他們決不願把流血追隨的兄弟做政客賭博的資本，非到萬不得已時不肯輕於用武。可是那些「暴發戶」的富於領袖慾的軍人，把兵士看作不值錢的奴隸，經不起政客們一次兩次三次的挑唆慫恿，便勇敢的內戰起來了。

本來，革命的力量應該建築在多數民衆身上，不應該依賴少數的軍事領袖。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候有一個寶貴的口號。

「第一步變軍閥的武力爲革命的武力！

第二步變革命的武力爲民衆的武力！」

這一個口號，實是處置武力最現實最科學的路徑。北伐成功後，領袖慾熾盛的軍人要攘奪地盤，攫取位置，雖於曹吳軍閥既倒之後，還拚命吮吸了民脂民膏來招兵買馬，對名義上初告統一的中央

發動內戰。於是「第一步變軍閥的武力爲革命的武力」這半個口號大家都似是而非的在拚命幹，而「第二步變革命的武力爲民衆的武力」的精髓却置在腦後了。食得 的軍人總以爲自己手裏的軍隊越多越好，恨不得把全國四萬萬五千萬的人民都收編爲自己的軍隊纔爽快，却不想兵多了國家財政怎樣維持，國民經濟怎麼得了！

九一八東三省事變以後，「武力統一」的好夢終究打碎了，有如朱子文院長所云：「內戰時代，行將告終。」但我們不要過於深信人類偶然受某種刺激而良心發現的作用，事實上如山東四川等省的軍人雖在國難時期也免不了火併廝殺。軍人們偶然的良心發現既不可靠，那末所謂「光榮的統治」「和平的統治」究竟怎樣實現呢？中國喊裁軍或編遣已不止一次，並且也做了不止一次，可是和平的統治終未實現！我們應知中國不單兵多爲害，主要原因却在於軍隊的多頭現象和外抗不足內戰有餘的現象。所謂和平統治，並不是要廢除一切軍備，武力和和平統治需要更新式的軍備，需要更堅強的武力，要這樣纔能抗禦外來帝國主義的武裝進攻，掃平國內野心軍人的跋扈行爲。

堅強的能夠永久爲革命服務的武力是什麼？我們如不是健忘或神經昏亂的話，誰都知道這是民衆的武力。社會在動亂時期，政府即使禁止民衆有武力，民衆的武力也自然而然的要成立起來。人民不許有槍，但人民爲了要「保家衛國」，都蜂然起來辦大刀會辦紅槍會，有了政治意識的甚至起來暴動編練反政府的軍隊，九一八後又新添了名目繁多的「義勇軍」「救國軍」。這許多「保家衛

國「圖謀自身生存的武力，都是民衆的武力，我們如能使牠普遍起來而積極加以領導，那就外患不足憂，內亂也不足怕。中央受了一二八滬戰和剿共軍事的經驗，對於民衆的自衛事業現在也特別注意了，各省縣市都積極籌設保衛委員會和民團。可是民團專注於軍事訓練而忽略了政治訓練，這裏面實蘊藏着不堪預想的矛盾。因為我們不加政治訓練，一般野心政客野心軍人自會去暗中訓練；我們現在諱言革命，但將來鬱而暴發起來，星火燎原，也許會弄到不可收拾，雖然民間的武裝惡劣，有異動時不難剿滅，可是那種不教而殺的「痛剿」大兵到處，虛舍爲墟，非但「有傷仁心」並且也損滅整個的國民經濟，動搖統治的基礎。

現在提倡人民自衛，整頓民衆武力，當然是切要的任务，但必須與「變革命的武力爲人民的武力」的口號聯繫起來，政府除保留若干精良的有新式戰具的中央軍以作國防剿匪之用，無家可歸的士兵撥去築路屯墾，受有政治訓練的士兵軍官便去領導或加入民團。這在政府方面節省了鉅大的餉額，中央軍因改良戰具亦充實了力量。在革命方面因有廣大的民衆武力爲後盾，野心軍人和野心政客雖想作亂，也受着威脅不敢發動了；但這必須民團有深刻的政治訓練，如果民團沒有政治認識，便隨時會被軍閥或政客所利用。總之，培植民衆的武力現在已是急不容緩，但必須抱定「變革命的武力爲民衆的武力」的目的，站在革命的立場上去進行，否則什麼民團，什麼自衛，不是時髦文章，便是新種一些禍根！

三 澄 清 政 治

大革命後，經濟衰落，生產停頓，全國民衆都陷入無路可走的環境中。一部份年壯力強不甘沒落的便去投軍當兵，一部份思想變態的便去做土匪，綁票和竊盜，年老身弱的便只得做乞丐流民。一般黨員和進步的智識份子們因為有優越的地位和出衆的社會活動能力，用不着去當兵，做土匪，做乞丐，潮水似的湧入政界了。政治須歸黨領導，受黨指揮，本來沒有疑問的，可是政治一旦變爲黨員角逐個人生活的場所，那就不成體統了。

在黨的祕密時代，一些同志們都在工人農民商人中做着鬥士，革命成功，忽然辦政務，自然昏昏然的莫名其妙。於是取巧的同志們貪圖辦事熟手，在手下搜羅幾個舊官僚做祕書科長或「祕密顧問」，那就不得了，一切軍閥時代的怪現象都會在青天白日旗下面複演出來了！從出生入死中奮鬥出來的同志們，誰都不甘心做反動腐化的事情，可是當我們的「熟手」和「祕密顧問」強奸代行了以後，也只好一笑置之，久後竟就同化了。

政治是一切社會活動的總樞紐，政治腐敗而整個社會能夠不腐敗，那是從來沒有的。挽救中國，首先得從政治着手，一切駢枝機關及冗員須痛快裁撤，嚴厲懲罰貪污，善良的官吏確定保障他們的生活辦法，同時以提高民權爲目的，盡可能的推行地方自治。但是整本清源的辦法，須使不專長政治

的黨員不再向着政治的路上亂鑽亂跑！據一般調查，住在南京各旅館客棧候補做官的往往有三四萬人，照這數目推算，全國想做官而等着的至少當有四五十萬，加上一股新舊智識份子失業賦閒的就有一百萬。不把這候補的一百萬安全的處置，而求現任的官吏廉潔熱心，這是緣木求魚。一個現任的位置背後往往有四五人在候缺，在鑽營，稍有不慎或忤逆上方意旨，便馬上有撤職另委的危險，現任的當然都存心五日京兆，專想撈幾個錢壯壯腰了。

所以要澄清政治，必先掃除鑽營候補的隊伍，什麼委員，什麼專員，說好聽些是多了一個駢枝機關，多耗費幾個民脂民膏，說得不好聽，那末普通官吏剝削人民，高級官吏則剝削低級官吏。這樣疊床架屋，層層剝削，你想中國如何得了。

掃除鑽營候補的隊伍，當然不是幾句簡單的話。大批的同志們所以會落入鑽營候補的隊伍裏，實是因為沒有出路可走，如有其他的出路，誰願意去鑽營呢？中國物產豐富，鑛藏更多，如果產業發達起來，中國人民決不會沒有出路的。不過發展產業應該由政府、和黨去直接領導，單靠民間的自然性的發展，絕對沒有希望。黨與政府既須負發展產業的領導責任，那末大羣的黨員，至少那落在鑽營候補隊伍裏的一百萬同志應該立即回到生產隊伍裏去。黨員們大都是有智識的社會優秀分子，只要政府與黨的中央有決心，確定孫中山氏錢幣革命的實行步驟和社會資本主義的基礎，那末現在做着游離分子的一百萬同志便是發展中國產業的生力軍。這樣非但中國的經濟有了發展的前途，政

治上的種種腐敗現象也澄清了。

四 確立正義和平的外交政策

在現代的世界，國際關係複雜異常，並且任何國家都不能避免或脫離這種關係，有如社會的各個成員絕對不能離開社會一樣。假如一個國家脫離了國際關係，那末牠將喪失了國家的資格，不成其為國家了。可是所謂國際關係，並不一定要去遷就，要去屈服，失掉了民族自由。立在正義的基礎上，抱着奮鬥的精神，我們也可以創造新的國際關係。蘇俄自從共產黨革命以後，最初在國際間的關係極惡劣，各國都不承認牠是國家，甚至想聯合起來去推翻牠，可是蘇俄始終不離開正義，經過了長期的奮鬥，現在各國都不得已的要承認蘇俄，和蘇俄做朋友了，蘇俄這種良好的國際關係，絕不是從遷就中得來，或是從屈服妥協中得來，而是從正義中奮鬥，重新創造出來的。

中國自從昏潰的滿清帝制政府造成了惡劣的國際關係；滿清政府推翻了後，袁世凱要做皇帝，又和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的亡國條約，國際關係更惡劣了。此後黎元洪等的共和政府也只是勉強圖存，苟延殘喘，沒有改善；却還加借了許多外債。中間廣東獨立政府雖沒有經各國承認，但實質上却表演了自主自治的獨立精神。北伐軍克服武漢，定都南京，國民政府因內部發生糾紛，經不起帝國主義國家聯合的威脅與利誘，不得不將歷來抗爭的態度一變而趨向屈服和妥協，於是出師時所喊的「

廢除不平等條約，現在連修改都很勉強，像二十一條那樣無理苛虐的條約日本還固執着不肯放棄。結果國民黨統治中國六七年，中國的國際關係還依然是惡劣的。

國際關係惡劣，外交不能獨立自主，非但政府對內漸漸失去信仰，人民時時刻刻在懷疑政府，不能與政府忠實合作，華僑在外國還要受盡壓迫和侮辱，國際貿易的商業損失更不堪計算，於是政治上更有形的影響尙小，經濟上財政上的損失更大了。九一八事變後，因受外患刺激，全國民衆如醉如癡的狂怒起來，一方面恨日本的無理侵略，一方面却也怪着政府的懦弱，政府領袖迫於大勢，纔把一些對內的力量轉向對外，注意到外交。各國虛懸着的使領，也逐漸委派了出去。不過我們所不能完全信服的，就是九一八後的中國外交還是被動的，中央死心塌地的信任國際聯盟，完全被國際聯盟支配着，挨延時日，坐誤戎機，這種外交決不會有好的收穫！

中央政府只是害怕着帝國主義的大砲毒瓦斯，以爲帝國主義者一怒便可以亡中國。殊不知事情決非如此簡單，政府只要提出正確的主張來與人民忠實合作，向全世界的人民呼籲正義與和平，中國非但不會滅亡反而得以提高國際地位，創造良好的國際關係。歷史上這樣的前例已有很多，主要的如美國獨立，蘇俄革命，土耳其復興，美俄土如不圖自主自治，努力外交上的奮鬥，主張國際間的正義與和平，恐怕現在這樣的強盛連做夢也不會想到呢？可憐中國，對內因爲個人權位所關，對於維持三民主義的正義，手頭雖然沒有實行，然而口頭總是喊着，對外就比處女還害羞，左右不敢提起三

民主義，更不敢主張什麼正義——提起正義，不平等條約便要廢除的。比起共產主義的蘇俄來，外空上死力維護着列寧的正義，耗鉅額的經費與力量建設第三國際，相形之下，真要令人羞死！

介紹兩本關於中國經濟政策的著作

沈修節

1. 經濟革命救國論(徐青甫著)

五四運動以後，所謂「西學」好像狂潮一樣的侵入中國，其中最令人目眩神昏的便是經濟學，歷史上，中國的思想學術是極模糊極混亂的，幾乎把一切「實學」的學問稱之為經濟學。待「西學東漸」許多留學生把歐洲的思想學術介紹過來，經濟學的名詞纔為一般人所熟知了。可是這裏隨來了一個弊病，那便是學者們的生存活剝，經濟學在中國不出學校的大門。學者們把歐美日本的著作翻譯了過來，或是改頭換面的偷襲了過來，大家便叢集在大學校裏教給學生。至於經濟學究竟有什麼作用，非但學生不知道，就是大學校裏的教授也未必知道。學而不用，這正是中國的經濟學不出校門的特色。

大概是五個月前了，在一家書店裏見到了徐青甫君的「經濟革命救國論」。當時半由嗜愛經濟學著作的衝動，半由書價的便宜(二十餘萬字的大書價祇六角)便即買了回來。放在架上，一直沒注意，又過了兩個月因無書可讀，纔把牠來讀了一遍，這纔使我吃驚了。

在作者的「自序」中，「不入黨，二不做官」這種中國士大夫階級假清高的劣根性是使人生厭的。正文不能集中的闡明自己的主張，把巨量的篇幅化費在引證或鈔錄別種經濟學說上面，使讀者感覺到蕪雜，這也是令人生厭的。可是生厭的地方儘管生厭，在作者的主觀主張上却自有其獨特的價值，這部著作打破了中國經濟學不出校門的習性了。當然，在一般文人學士的眼光中也許會覺到牠沒有目前中國有權威的經濟學者（？）馬寅初李權時諸公的作品來得高深玄妙，可是我們終究不能不承認這是校門以外的作品啊！

在作者的「自序」中，知道作者在青年時代是實際參加社會革命活動的。因有這長期的社會活動，作者得到了許多可貴的社會實際經驗。這些實際經驗，正是作者在經濟學方面能夠得有成功的基礎。雖然「不入黨，二不做官」的劣根性使作者的經濟主張仍滯留於書本子的境地，不能有什麼實際的表演，但這種成功仍舊是可寶貴的。至少，這部「經濟革命救國論」是努力中國革命的青年們一個主要的有價值的參考文獻。

全書共分四篇。第一篇「我國現狀與成此紛擾之原因」是概論中國目前經濟背景的。第二篇「我對於經濟上之觀感」是闡述作者的經濟理論。第三篇「我之救國方策及其施行程序」可說是申述作者對於中國現實經濟的主張。第四篇「子擬方策之釋疑」是作者預擬的對於問難的答復。

看於作者所擬的十三條方案，作者的思想似乎傾向於國家資本主義與孫中山先生的「錢幣革命」更極接近。但作者對於政治的修養似乎不十分深入，於是在「施行程序」上定出預備、改革、強迫、開放四個時期。這種機械的劃分時期，簡直忘記了社會是在現實的歷史性的轉變中。把社會當做一部機器，以為只要大家同意，大家覺醒，便可隨時隨意把這部「社會機器」開向左轉或開向右轉了。試問社會變革是這樣的滑稽簡單嗎？孫中山先生在政治變革的歷史上劃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這當然是絕對正確的。但在經濟上，我們就應當依照列寧主義的劃分方法，在某種經濟基礎規定某種經濟計劃，祇有第一期計劃第二期計劃等等的劃分與差別，絕不應有所謂預備時期、改革時期、強迫時期、開放時期等等的劃分。否則孫中山先生及其黨人費四五十年的努力纔取得了中國的政權，爲着什麼呢？正是爲着經濟啊！

作者在經濟方面的努力是極可寶貴的，但在政治方面的超然態度則不得不爲之憾惜！

2. 有利流通券與金融信用（馮世範著）

一九三二年在中國的經濟社會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年頭。由於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和世界經濟恐慌的襲擊——傾銷政策的活躍——中國社會出現了空前的騷亂與窮乏的現象。普遍全國的水災、旱災、兵災，接着還來了「豐災」，籬價跌去三分之二，稻價穀價跌去二分之一。中國是農國，國家財

政與國民經濟完全依賴農業，農村經濟破產，整個的中國自然要震動的。

在這混亂的一年，政府與人民似乎都有了覺醒，人民於樂天知命外知道要監督政府，政府於內戰殺伐外知道要整理社會經濟。於是統一幣制整頓財政成爲狂熱的潮流，尤其幣制問題是政府與人民一致注意着的。七八月間，財政部提議廢兩改元。九月初頭，南京有中委所領導的中華錢幣革命協進會，九月底，馮世範君的「有利流通券與金融信用」也趕着時會出來了。馮君這部書，版權頁上印的是六月出版，但廣告到九月拾肆日我在申報上纔看見，當時我到開明書店連跑了五趟都回說沒有這書，直到九月底纔買到手，共計書價四角，電車錢六角多，我對這部書的熱心真不小呢。

馬克斯說錢幣是社會經濟的紐帶，錢幣對於社會經濟的關係當然是極重大的。所謂資本主義社會，完全是以錢幣的運用爲棍桿，沒了錢幣，資本主義經濟便什麼都沒有。也許連整個的人類社會也會什麼都沒有呢。可是我們的觀念不要太機械化，太偏重形式，以爲社會上一切經濟現象都不必注意，不值一顧，只要把錢幣制度看得準就好了。其實這完全錯了，錢幣的產生完全應着社會的需要，無論怎樣完善的錢幣制度如不適合社會條件，對於經濟的發展是不發生效力的。我們只要看廢兩改元運動和南京的改革錢幣運動對於中國經濟都沒有發生預期的效力，就可以相信這種說話是不差的。

馮君主張發行有利流通券，這並不是什麼新奇的見解，不過是自由主義下一種救急的治療方

法罷了。大戰時各國都以紙幣政策維持國家經濟，這種政策暫時是有奮興劑的功效，但終結却是一個莫大的社會的災難，維持的期間越長，災難便越深。馮君的方法與大戰時紙幣政策的不同點：第一是大戰時紙幣政策以政治壓力強迫人民接受，馮君以利息引誘人民接受。第二是大戰時紙幣政策的紙幣由政府擔保發行，馮君的紙幣由財產擔保發行。這兩個不同點，形式上雖有差別，實質上是一樣的。在第一點則利息的引誘還不如政治的壓力來得容易使人民接受，那末有利流通券反遜於戰時的紙幣政策了。紙票不是財富，流通券雖然「有利」，結果也終於逃不過通貨膨脹以後的災難。否則歐美日本那些自由主義的資本家比我們聰明得多，他們早就實行了。

馮君的著述，我們雖然否認牠在實際方面的基礎，但在學理上却自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馮君是置身政治的人，置身政治而又能顧到經濟問題，對於社會的實際經驗當然是很豐富的。假如馮君能把對於錢幣問題的努力轉移於社會的生產力和經濟關係中，即在社會的生產關係與擴大再生產的過程中致力錢幣問題，這樣研究的成績一定會更實際，更可驚人。如單單只注目於錢幣問題，注目於金融問題而忽視了其他一切的經濟現象，便必然會陷入於自由主義的空想。孫中山先生「錢幣革命」的偉大價值不在於錢幣革命的本身，而要在民生主義與實業計畫的發展中纔能放出燦爛的光輝！

第三種人與同路人

S
W

我是根本不承認有第三種人存在的，不單在文學上，就是在政治上也是沒有的。假如一定要有，那也不過是一種逃避革命的人的遁詞，或者是一種革命集團對於另一些可左可右的動搖份子的別稱。其實所謂第三種人，我們如判斷得嚴酷些，只能把牠當作羣衆看待，至多牠們不過是羣衆中間的智識份子或上層份子而已。

社會人羣在政治上的分界，第一是友人，第二是敵人，第三便是羣衆。在羣衆這一個名詞下，包含的社會層便非常複雜，有工人，有農人，有士兵，有學生，有教授，有學者，有著作家，有流氓，有商人，還有那些奇奇怪怪的長頭髮的藝術家，染着口紅白粉的娼妓，兩腿鍊得特別發達的跳舞家。總之社會是那樣的一個錯綜複雜的組織體，五花八門，幾乎使人無從識別。可是惟其錯綜複雜，惟其五花八門，纔成其爲社會，纔成其爲羣衆，這裏面有敵人也有友人。理論上的革命專家們如果要於友人敵人之外別立一個第三種人的名稱，好多去嚼蛆寫幾個字賣稿費，多開幾次掉弄槍花的會議，我想把整個的羣衆去當作第三種人也好。否則就太飄飄然的不着實了。試想，當革命的任務正在迫急繁忙的時候，而我們却幽然的清清閒閒的找着一些社會的上層份子，強稱之爲第三種人而爭論怎樣去對付牠

們，這不單是優，而且是迂！

羣衆是不會有罪的，一個毫無智識的農民可以是羣衆，一個被統治權威憎服着的學者也可以是羣衆。羣衆既然是應該尊敬的，那末我們爲什麼要特創一個帶着蔑視意味的第三種人的名詞去加給一些上層份子的羣衆呢？

蘇聯十月革命時代，蘇聯的文藝界也同樣鬧着一個同路人的問題。這個同路人，在名詞的性質上頗有些和第三種人相類似的。同路人的意義是革命集團對於某些有希望羣衆的稱謂，承認某些人是可以與革命同走的，只是表現得不積極。但現在，同路人已經不存在了，有的同路人變了敵人，有的同路人則成了友人；同路人沒有完全同走，也沒有完全落後，並不比一般的羣衆更多一些特殊之處。政治上不能把對革命表同情的工農稱爲同路人，文學上却偏要把對革命表同情的作家稱爲同路人，這也許是一般多聞的文人學士愛咬文嚼字，愛掉弄花樣吧？

中國的所謂第三種人，和同路人的意義又完全兩樣。同路人只是革命的隨從者，並沒有超出於政治關係以上。中國的第三種人竟是一種特別「聖潔」的人，是一種超階級超政治的人，這就把蘇聯同路人的意義根本翻倒過來，不是第三種人隨從革命，而是革命隨從第三種人了。依據胡秋原自由人的解釋，依據蘇汶文學上的不干涉主義的解釋，我們這樣去識別同路人與第三種人的根本意義，也許不會有異議吧？可是胡秋原與蘇汶兩君假使要這樣簡明顯確的把第三種人的定義承認下

來，而不用任何曲解的飾辭，那末好，胡蘇兩君的狐狸尾巴完全露出來了。這兩個人同是因恐懼畏縮而逃避革命的，不過逃避的方法各不相同，胡君是退縮，退縮到了自由人的「聖潔」的地位；蘇君却另有說詞，高超，高超，高超到超過了革命，高超得上了天。

蘇聯有同路人的名詞出現，在現實與意義的比量上，也許是事實所許可，但我認為在廣大羣衆之中拉出或跳出一些人來別立爲同路人的集團，這實在是一種糊塗，難道既可同路還不能成爲友人嗎？但在中國，那些懦劣的先生們又要搶着革命的小紅帽子往自己頭上戴，甚至還要爭個馬克斯列甯主義的正統，但又怕統治者的硬鬚鬚觸着們的嫩面孔，深怕弄出血來，於是大嚷其「自由」「聖潔」「我是第三種人」了。所以蘇聯的同路人是個糊塗的名詞，中國的第三種人却是一個可恥的名詞。

政治上只有兩種人，第一種友人，第二種敵人，這兩種人都是從羣衆生出的。此外，我們找不出第三種人。假如一定要找，那末蝙蝠派的好細，騎兩頭馬的騙子，戴小紅帽子的論客，飛上了天的高蹈者（高蹈者遲早也要爬下來，不過他要看看風色）這些寶貨，在目前的中國也許可以堆滿一個垃圾桶。我們如要把這個垃圾桶堆得好有一些，可以把胡秋原與蘇汶蓋在這個垃圾桶的頂上，因爲這兩位先生在理論上是代表這個垃圾桶的啊！

★

★

★

★

文學總是隨着政治，或是與政治結合着密切的關係。不論某種文學做了保守的工具抑做了革命的工具，但文學的不能離開政治或超出政治是一樣的。歷史上似乎有過不少的先例，一些好巧的作家們利用着人類的色慾，引誘人們走入虛迷的道路，或走入色情狂的道路，於是有所謂藝術至上主義，有所謂鑑賞主義。其實所謂藝術至上主義，所謂鑑賞主義，表面上是沒有政治關係，實際上是被統治者當作壓迫羣衆的麻醉劑，做了良好的保守工具。

蘇汶君的文學不干涉主義，表面上是說「不要干涉」，實際上却會變成「不去觸犯」，「不去觸犯統治者的虎鬚，自然不會有干涉來了。可惜這種東西不是新的而是舊的。中國的歷史是君主，人民，文士三種主要的東西組織起來的，君主不能直接去統治人民，常常要利用文士，這時的文士既非人民又非君主，他們便自命爲第三種人了。君主有時會「昏庸糊塗」，人民有時會「暴亂囂張」，但第三種人的文士却永遠是「聖潔」的，永遠是「至高無上」的。不過我們如要去嚴格分辨一下，那末爲君主所豢養的文士，簡直就是君主的本身，只有爪牙與首領之分，而並沒有第一種人與第三種人之分。蘇汶君既不敢把文士加入人民這一方面，但又要保持文學的尊嚴與聖潔，不好意思直捷了當去加入君主這一方面，於是照中國的傳統方法在君主人民之外把文士另立爲第三種人，那最是巧妙不過的。

發展人類的色慾也好，發展人類的偶像慾或崇拜慾也好，好在這些都是第三種人的傳統的拿

手好戲。好戲開場，什麼「自由」的「聖潔」的臉具都可以隨手取戴了。猴戲主人是第一種人看客是第二種人，這兩種人之間必需有第三種人的猴子在播弄，在頑把戲，於是看客袋裏的錢便會很自然的滾進主人袋裏去了。這樣，主人回到家裏纔要好好的撫養猴子，把猴子打點得蠻有趣，那末猴子與主人之間，實在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

★

★

★

文章寫到這裏，預備結束了。不過最後我還要說明一點。蘇汶和胡秋原的第三種人是反「左聯」的標幟，但我的反對蘇胡兩君並不就是同意於左聯，我這裏只是講明了一個文學上的公式理論而已。

蘇胡兩君公表自由人和第三種人的主張，目標是對着左聯，但左聯却是那樣的有耐性，竟不會有過具體的回答。就只魯迅說過一句簡單的話：

「他不單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誘那些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來同走呢。」

這裏，魯迅把自由人，同路人和第三種人混淆在一起了。魯迅這樣糊塗的去解釋自由人和第三種人，不知左聯的人能完全同意否？我的私意，覺得魯迅爲了要招納同路人，招納自由人和第三種人，以至於招納「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竟顧不及羣衆了。也許羣衆就在魯迅的袋裏吧？

在討論到文學和政治的關係上，我的意見也許有更大的不同，但這裏已溢出範圍，不多講了。不

過我希望一切的人忠實於自己的政治主張，忠實於自己的社會思想，不做奸細，也不做活猴，不迎合，也不逃避，那樣是高尚的，至少在政治上不失為一個硬漢，在文學上不失為一個熱情者！

一九三三，一七。

現代十二月號略評

徐曾燦

那倒是真的，無論在質量上，在數量上，在編配和印刷的技術上；現代在目前一般純文藝雜誌中，確乎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了。

這裏，我打算把最近的十二月號作一個簡略的短評。

郁達夫先生的新作遲桂花，據他自己說是一篇得意之作（見社中日記引達夫家書語）但我用心看了兩遍，也還看不出有什麼特別好的地方。開頭一封長信，既冗長，又煩碎，這說明達夫做小說一直做到現在還沒有用過巧妙的結構，嚴謹的體裁。通篇看來，就祇是作者和翁則生的妹妹一起上五雲山遊玩的一節寫得好一點，文字也比較清麗，有着一種淡淡的抒情味。其餘，則都是很平凡的。

謝達明先生所譯蘇聯伏爾可夫的小雄雞，倒是一個非常出色的短篇；它能用極經濟的手法，寫出十月革命後三年內白軍與赤軍在國內各地作十分頑強，十分尖銳的戰鬥的斷片。作者寫頑固的老伯父因了他心愛的小雄雞給白軍的軍官殺死而反抗白軍的那故事，非常自然，非常有力！這種地方，我以為，是很值得國內許多青年作家去學習的。

儒開先生的蒙慕是一個富有地方性的短篇。描寫的技术很好，如胡三，如老客，如春芝，都栩栩如生。

活，形態逼肖。但一篇萬餘字的小說就着力寫那麼一個村夫村婦的羅曼斯，似乎沒有多大意義可言。朱雪先生的饑餓線，是自由談話者流的姊妹篇。寫兩個從水災區域的收容所裏逃出來的青年農民，大發和三得，是異常生動的。看了這，使我們憬然，感悟到目前的中國，是有整千整萬的貧民在饑餓線上掙扎浮沉的那事實，社會是怎樣急迫的需要改造啊！

施蟄存先生的四喜子底生意，比作者在以前幾期現代上發表的作品都好，非但文字寫得十分活潑清新，而且是相當地把握着勞働者底真實的靈魂的。

胡秋原先生的浪費的論爭，那真是所謂浪費的論爭了！我並不是有意說壞它，真的，就照他那些宏論卓見，無論如何，有了原文三分之一的字是儘夠了。其餘三分之二，全是不必要的費話，帶譏帶諷的村婦的術語。除非想增加收入——一元至四元的發表費——我想那是無需乎的。關於自由人和第三種人問題，我覺得魯迅所說：「他——指左聯，作者註——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誘那些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來同走呢。」倒是一個很正確的意見。

戚克家先生的詩，頭兩首不好，末一首當爐女比較好一點。

老舍先生的貓城記，因標長篇，此地不具論。

再，司各特百年祭和高爾斯華綏特輯，因係應時文章，限於篇幅，本文也不多談。

現代文化一卷一期略評

揚帆

首先應該說明的：現代文化各位作家以新興的戰鬪員底姿態出現於浮薄得可憐的中國文化戰場上，是值得我們每一個前進的青年加以正誼底注視的。但在真理還隱約於飄渺的雲間底目前，他們的主張當然也不一定全對！因之，我們有誠摯地來替它下一番檢討工夫的必要。

真的，要談到自由人和自由人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等等的問題，倒確乎用得着來他媽一個「專號」的。但我們的篇幅却不允許我觸及問題底核心，祇允許我做一個簡略的概評！基於這一層理由，所以想做一個在論戰中的「自由人問題」的結論的野心我是沒有的。

歐陽霽舉先生的自由的秘密，正如作者的自白說是「會使人感到重複」的；而且文字的技巧也不怎樣好，有許多地方很犯了拖泥帶水的毛病。不過他却給與莫名其妙的胡秋原理論一個系統的清算，和無情的駁詰，如十階段論的穿鑿附會，古代資本主義的滑稽可笑，奴隸制度的憤懣迷離等等。但主要的論點却在中國目前民族資產階級是否存在的問題上。在這一點上，我倒也以爲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是存在着的，不過是帝國主義的附庸而已。

其次是講到態度上，歐陽先生那種下劣的開頑笑的态度我是不同意的。現在扎幾句出來看看：

「無產階級專政是可以由人猿階段而來的，好像胡秋原的媽媽可以是老母豬一樣。」——見這種對「人」的侮蔑和理論有什麼關係呢。

方萌先生的論胡秋原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比自由人的秘密裏所指斥的是更為精闢的，他非但辨明了馬克司列甯和樸列汗諾夫主張的異同，并且也有着很正確的意見。如：

「……如果你的理論是對的，縱不是出自馬克司，也是對的而得人贊護，如果你的理論是錯的，縱你證明出自資本論第幾章第幾頁也是徒然。同樣胡秋原先生的文章全篇都是馬克司恩格爾斯文章的抄剪，却不能證明他是馬克司主義的作品，因為馬克司一切著作並非聖經。」

這不啻給一般把馬克司主義團圓吞下的理論家革命家一服清涼劑，因為中國這種理論家革命家正多着。其餘諸點，和歐陽先生所論大致相同，這裡不再贅述。

首甲先生的關於胡秋原蘇汶與左聯的文藝論戰，它不但痛快淋漓的駁斥了東抄西襲的胡秋原理論，并且還嚴正地指出了左聯的弱點。不過有一點我却不能同意，首甲先生說：

「……左聯的軟弱，和左聯理論家錢杏村的理論上的不充實，我們不必為左聯深諱，并且正應

該加以糾正。但胡秋原先生對錢杏村理論清算的那篇文章，在態度上是已經并不誠懇。作使胡秋原並沒有進攻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決心，可是事實上變成不僅在惡意的指摘錢杏村個人，而欲動搖羣衆對左聯的信仰，破壞左聯文學上的領導權，乃是非常明顯的事。這樣實際上，便已站在反左聯，反無產階級文學的戰線上的……」——P. 五。

這樣問題便來了。錢杏村理論是錯誤的，而也是左聯的人們所公認的。但何以給胡秋原指出來便不可以呢？理由據說是爲了「惡意」和「欲搖動羣衆對左聯的信仰，破壞左聯文學上的領導權」。這是左聯一貫的錯誤，而也是首甲先生同樣犯着的錯誤：實際上，羣衆不盡是愚蠢的，犯了錯誤而不肯在羣衆面前承認，那才真正會使羣衆對左聯的信仰失却呢。其實，是應該這樣子的：錢杏村理論既然錯誤，那不管你胡秋原來清算也好，王禮錫來清算也好，左聯應該當了羣衆的面，把他們指摘得對的地方接受下來，把不對的地方再加以解釋。這樣，羣衆的信仰固然沒有失却，領導權自然只有日益堅定，而且還會獲得一個「樂善從流」的正確的方法。不然，照首甲先生的語氣看來，那簡直是危險得很。好像是要和胡秋原打個招呼，說：「不錯，錢杏村是錯的，但以後請你不要當了大家的面說出來，因爲這樣，會給我們愚蠢的羣衆以不良的影響的。假使有什麼話，千萬請你到幕後來說，無論什麼條件都講得妥的。」

這錯誤，左聯應該立刻糾正，不然，羣衆一個一個都會跑掉的。

其次，首甲先生對左聯的偶像主義情面主義的右傾毛病，也有極尖刻的指斥，對左聯作家的作品也有極優秀的解剖，如丁玲的韋護，水和黑夜，茅盾的三人行和路等。

關於蘇汶先生的理論我有幾處地方是同意的，當另爲文申述，此地暫不贅評。

歐陽蒞舉先生的對於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襲擊，除了把陶希聖，王禮錫，胡秋原，李季，任曙，嚴靈峯，朱新繁，劉鏡園等各人的意見歸納一歸納之外，可以說一些沒有旁的東西，而且結論也做得非常籠統，如：

「但是因爲反對帝國主義，和土地革命正是廣大羣衆在動手進行着的爭鬪。他們也就是在真實地做着中國社會經濟性質論戰的結論。」可是，這結論是不夠的。

谷非先生的現階段上的文藝批評之幾個緊要問題，倒是這一期現代文化裏最有價值的一篇文章。它非但全般的見解十分正確，而對目下一般享有時譽的作家也給他們下了一個嚴格的估價。如張天翼的二十一個描寫兵士生活的觀念化，黑炎的戰線描寫兵士和工人的連帶關係的表面膚淺，丁玲的田家沖，張天翼的三爺與桂生的對於現實的歪曲，從空虛到充實的對於因貼利底出路之暗示的不正確，鬼士日記的對於資本主義現階段的本質之認識的錯誤，小彼得的取巧規避，找尋

刺激的人和蓬子的一幅剪影的認識模糊，這些假使不經谷非先生無情的把它們批判一下，許多愚蠢的羣衆還當着寶藏在閱讀呢。這一點，我以為，是應該歸功於谷非先生的。

國強先生的國聯大會的展望，分析和論述是大致不錯的。易君先生的歐洲的恐慌與小協約國，雖則很短，而觀察倒也是很正確的。孤懷先生的印底的貴族文學及其影響，是一篇很切實的著譯，看上去，寫起來便很吃力的。掘田昇一的黃色十字彈，雖然寫一個毒瓦斯工場寫得還算周密，但好像總帶有一種日本式的無力和浮薄。巴比塞的文明的進步和污點兩個短篇，則比較上都算是好的。

中國革命的經濟政策

周毓英

第一 導論

第二 銀行政策

第三 交通政策

第四 農業政策

第五 工業政策

第六 商業政策

本文在這裏發表，已經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用乳鷹的筆名在中華評論上發表的。當時隨寫隨登，粗疏異常。但出乎意外的是頗得了胡漢民先生的青睞，同時胡先生於高興之餘還寄了不少的詩作和着本文一起發表。第二次是一個朋友把牠帶到北平對抗上去發表，署名則用了朋友的名字。現在，痛快用我的本名在這裏發表了。

一篇小文章，本用不着東發表西發表。不過我也有我的意見，當我的主張沒有給人家完全打落下去，而又未見到有比我更好的主張的時候，雖是一篇小文章，也不甘心讓牠無聲無臭的隱滅下去。並且，世上的事情也太不公平了，一個政治偶像的血壓高了或小便濃了，便有舉國若狂的人去擔心它。無名小卒們成年累月的心血，反沒有政治偶像們的小便來得動人。本文的所以要發表三次，也許正是一種報復吧。

本文導論內所解釋的各種關係，有許多是草率，有許多是不必要的，現在略略加了一點修改。關於建立「社會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我覺得在政治上的實行專政和獨裁是必要的。經濟的社會秩序完全靠政治而存在，現在要將「自由資本主義」的畸形經濟和「半共產主義」的散漫經濟改正過來，實行創造幸福的和平的國家和社會，沒有一個堅如鋼鐵的獨裁的權力，就會一步都行不通。這點在修改時未及補充去，只好等有機會時另文申述了。

一九三三，一二十二，作者附記。

第一 導論

許多人，常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着急。大多數的領袖們只懂軍事學，長於殺人，而缺少政治修養。比較少數的領袖們懂演講學，長於說謊話，長於做政治騙子。大家把革命最重要最根本的經濟問題丟在腦後，於是國民黨革命雖然取得了政權。但因經濟問題不能解決，致使六七年來的統治權，終究還在動搖不定中。「革命」在形式上雖然已經成功，取得了政權，但實際上却已成爲可怕的被民衆所厭惡的名詞了。

奪取政權是革命的手段，經濟問題乃是革命的最後目的，如忽略了這一點，任何革命都是要失

敗的。革命在初步的努力是建築理論上的基礎，喚醒民衆，推倒反動的統治階級；待到掌握了政權，便須立即努力於發展社會經濟的任務。民衆所需要於革命的，是爲了解決生活問題，若一個政黨在其未上台前以解除民衆痛苦爲號召，既上台後，而把先前所號召的話完全拋棄了，遲早是要倒台的。

我們深信孫中山先生在理論上在行動上從沒有放棄社會經濟問題的任務，但我們對於現在的國民黨祇承認只剩下國民黨的軀殼，已失去了民國黨的精髓，不能繼承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尤其不能繼承在經濟方面所負擔的使命了。

國民黨自十三年改組到現在，因爲隨着社會的惰性作用的轉移，組織上存留了不少的買辦土豪劣紳和大小軍閥，走上了封建性的絕路，沒有轉變，使很難在革命的大道上再移動一步。但其他所謂國家主義派，所謂社會民主黨，所謂中國共產黨等等，却是更加不合實際，不能完成中國革命。完成中國革命的，將仍然是中國國民黨。但這裏的所謂國民黨，必須是能夠負擔發展社會經濟使命的國民黨；像陳公博所倡導的「走向資本主義之路」以繁榮中國，也只是一個空中樓閣，萬萬不能實現。資本主義世界已到了沒落時期，而猶希望資本主義能在中國復興，這不是夢話嗎？

目前有所謂憲政運動，這只是一班士大夫階級對革命失望的情緒的表現，是國民黨在軍權籠罩下民衆所有的反感。憲政運動的結果只能亡黨，絕不能使黨「復興」。憲政實現後，充其量也不過做到曹錕那樣——說不定還一蟹不如一蟹——仍舊不能發展中國經濟，不能對中國革命有絲毫

的幫助。

目前中國的革命，已陷在極大的危機中，國外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內封建勢力的復興，以及由於飢荒所釀成的共產黨暴亂，都已到了極點；而在革命的本身，則民生凋敝，革命力量渙散。這一切，都是鐵的事實，我們無法否認。在這革命遇到了危機的情勢下，我們將用什麼方法挽救革命呢？社會的事實是早已決定了我們的行動了，挽救革命的方法，唯一是決定全國一致的革命的經濟政策，發展社會經濟，完成革命的根本任務。

決定和實行革命的經濟政策，這在革命是根本重要的任務。革命在未取得政權以前，所謂經濟政策只還是一個口頭宣傳的理論，待取得政權以後，必須立即把這理論轉變成行動。國民黨在孫中山先生存在的當時，在幾次北伐的時候，關於經濟方面的宣傳，都叫得震天價響。但等民國十六年政權奪到了手裏——因為國民黨革命的領導權繼從共產黨篡竊的手中奪回來，又陷入自相排斥分崩離析的局面中，致使過去所宣傳所號召的經濟政策絲毫都未實現，於是民生問題不得解決，民生主義不得實現，國民黨革命在民衆方面失掉了信用，湘鄂贛豫皖等十幾省的共產黨得到機會建樹起勢力來了，國民政府調動了幾十師大兵，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以至於十幾次的圍剿，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成功。

單憑殺伐的手段去希望勦滅共產黨，恐怕一輩子也不能成功。從解決經濟問題決失業問題方

面着手，那解決共產黨是很容易的。民生主義一實現，共產黨任憑有天花亂墜的理論，有進步的新式的紅軍，也決不能促起中國民衆的暴動。如果民生主義不實現，民衆的痛苦不解決，那末不論共產黨的理論怎樣幼稚，共產黨的軍隊怎樣惡劣，而那些在三民主義下掙扎着仍舊不能得到生路的民衆，都會很輕易的成爲共產黨了。自國共分裂後，大家都感覺到共產黨越殺越多，事實並不是越殺越多，只是一方面雖然在殺，另一方面新生長出來的却比殺掉的還來得快啊。我們如把共產黨生長的根本原因解除了，那末共產黨不等我們去殺去勦，也是要絕跡的。

共產黨生長的根本原因是經濟衰落，民生凋疲，解決這根本原因的方法當然是發展經濟，繁榮民生。要發展經濟，繁榮民生，在目前的情勢下，唯一的方法是實行國家資本主義。除了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外，非但整個的國民黨得不到出路，就是整個的中國革命，整個的中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也都得不到出路。

孫中山先生是反對共產主義的，但同時他是反對資本主義的，他的「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實實在在是限制私人資本發展，國家資本以實現民生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我們如果不是喪心病狂，或是瞎了眼睛，決不會承認「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

講到國家資本主義，在中國已經有很多人提倡過，但都只把牠當做口頭上宣傳的理論，一到行動的時候，便連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詞都忘記了。過去周佛海在「三民主義的理論的體系」中似乎提起過，改組派也有一個時期主張過國家資本主義。可是一遇到實際，要行動的時候，例如陳公博做到了實業部長，便大聲喊着「走向資本主義之路」把所謂國家資本主義丟在毛廁裏了。

陳公博向來是以熟悉經濟號召國人的，這次出長實業部正可說是適材用於適所。但真不幸得很，陳公博不相信自己是個空虛的經濟學者，祇會炫耀名詞，大着膽子去做實業部長；做了實業部長，他得意的「大作」第一部是發行公債五千萬，第二部是籌借外債×千萬，第三部是提撥庚款×千萬，陳公博這樣的東借債，西借債，以為這樣就算是籌設發展國家經濟的資本，就算是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就算是實行民生主義了。其實真可憐，陳公博這個「空架子」能否借得到錢做國家的資本是第一個問題，借到了錢能否真正用在發展實業上是第二個問題，這幾千萬幾千萬的小數目是否真正有力量發展中國產業是第三個問題。陳公博的實業計劃既蘊藏着這樣多的問題，還說什麼國家資本主義，還說什麼民生主義呢？陳公博在南京實業部的作爲，老老實實便是沒落的資本主義者的作爲，或許一個起碼的資本主義的企業家的手段還比陳部長高明得許多，一個起碼的企業家還能

自由借債，並且多少也能夠使他的事業實現一部分或全部分，陳公博這個空頭的資本主義的實業計劃却毫無實現的可能。

三

國家資本主義是一個怎樣的東西，孫中山先生早在民國元年的「救亡策」——錢幣革命論——的初期著作中已經顯現了端倪，後來的民生主義的演講稿和節制資本及平均地權的經濟政策，則更確立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基礎。孫中山先生不滿意資本主義，但同時又反對共產主義，就必然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而走上民生主義也就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不過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詞，一直等到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纔在蘇俄革命的導師列寧的口中特別嚴重而有意義地叫了出來。

國家資本主義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唯一必經的路線，不單是生產落後如中國和蘇俄那樣的國家要經過國家資本主義過渡階段，就是歐美產業發達的國家，恐怕也不能跳過這個階段，而一脚跨上社會主義的社會呢。所以中國人不必存着恐怖的心理說國家資本主義是第三國際共產黨的辦法，儘可依着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既成路線放膽走去。同時國家資本主義是孫中山先生早已建立下了的經濟基礎，共產黨的人也不必擔憂在三民主義政權下不能實現國家資本主義。革命是

爲着全中國的民衆求生存是爲着全世界的人類求出路，並不是爲着共產黨，也不是爲着國民黨，列寧在提倡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既不惜「犧牲一切的主義」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新經濟政策以求國內經濟的穩定和發展，那末爲什麼共產黨員還要緊守着馬克斯的半空想的社會主義的死路呢？爲全世界人類的利益，服從真理，並且擁護和執行真理，那纔是一個世界主義者，那纔是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者。如若堅執先入之見，迷信着一個非真理的思想，結果必走上個人主義的末路。試想革命而不能服從真理，不能忠實於全國民衆和全世界人類的利益，而至死不悟的忠實於一個黨，迷信着一個半空想的馬克斯主義的思想，我們雖不敢冒昧說這樣的人仍舊沒有脫掉個人主義的劣根性，但可以大膽說這樣的人乃是愚蠢的宗教的信徒，絕不是一個革命的信徒。

孫中山先生既首先在錢幣革命和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等政策中立下了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列寧在晚年施行新經濟政策的時代，則不惜「犧牲一切的主義」服從國家資本主義，那末國家資本主義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必經的階段，是社會革命的唯一真理，毫無疑義了。又列寧常說蘇俄社會主義革命的是否能夠成功，這與佔世界人口絕對多數的中國革命和印度革命有極大的關係，蘇俄必須時刻注意和幫助中國及印度的革命。中國與印度，同處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地位上，中國與印度如欲脫出帝國主義的經濟囚籠，希望反帝的革命成功，便必須實行國家資本主義。蘇俄如希望中國革命印度革命成功，便必須幫助中國和印度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民國十六年國共分裂

以來，蘇俄一心扶助着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這實在是幼稚的錯誤的策略。數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把中國中部富庶之區的農村社會都市社會的秩序完全擾亂了，食糧和茶紙等的生產完全停頓了。過去中國的食糧和茶葉可以大宗出口，現在中國却已成爲帝國主義者銷售食糧的主要市場，這不是承共產黨世界革命的賞賜嗎？幫助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擴展市場，削弱中國在經濟上反帝的力量，這那裏是幫助中國革命，促進世界革命，老實是在開倒車，破壞世界革命罷了。

中國與蘇俄，實在是世界革命過程中兩個唇齒相依的同盟國，並且，孫中山先生和列寧兩個領袖一個是中國革命的導師，一國是蘇俄革命的導師，這兩個導師在國家資本主義方面的主張既完全相同，那末凡是孫中山先生和列寧的信徒，都應該擁護而執行國家資本主義的。若懷着偏私的見識，懷疑國家資本主義的重要性，致使世界革命延緩下來，這樣的人非但不配做孫中山先生和列寧的信徒，事實上這些掛羊頭賣狗肉的主義販子，倒是他們的叛徒呢。我們知道，孫中山先生和列寧是一時一刻都系念着世界革命的利益，所以當初蘇俄與中國的攜手，以及共產黨的加入國民黨革命，這都是他們在佈置世界革命的行程上所應有的表現，待兩大導師相繼棄世，由於一些叛徒們的作用，同時因爲人類個人主義的劣根性終難肅清，於是共產黨惟恐國民黨革命成功，國民黨也惟恐共產黨形成勢力，積不相下，就互相攻擊內鬨起來了。我們如站立在孫中山先生和列寧世界主義的立場上去了解世界革命，我們便不得不赤誠地接受孫中山先生和列寧所親手釐定的計劃和方法。

所有的力量，努力促成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使中國能在經濟上形成反抗帝國主義的勢力。中國只要在經濟上有了反抗帝國主義的力量，那末此外的政治侵略和軍事侵略的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成功，就是中國的革命成功，在中國革命成功的時候，世界革命的問題就已經解決了大半了。所以中國的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不論蘇俄，不論第三國際，不論在中國的共產黨，假如他們正確是列寧主義者，正確是社會主義者，便都須積極起來幫助。否則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是中國實際社會所需要，第三國際共產黨縱便下了絕大的決心從中破壞和搗亂，結果也徒勞無功。

四

記得孫中山先生曾說過，國民黨第一步工作是推倒滿清皇朝，第二步便是剷除曹吳等軍閥。辛亥革命，滿清已被推倒了，十六年北伐，曹吳等軍閥也已經剷除了。現在要實行第三步工作，這便是繁榮社會經濟，發展國內生產力，施行國家資本主義，實現民生主義，完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革命在取得政權以前，牠當前的任務是圍攻敵人，推倒統治階級，既取得政權以後，牠當前的任務便是解決社會經濟問題，實現民生主義。民生主義在過去，在未取得政權以前不過是口頭號召的理論，現在國民黨已取得政權，國民黨已成了中國的統治階級，那末過去所口頭號召的民生主義的理論，必須開始轉變為手頭實施的行動了。革命如單憑口去鼓吹而不用手去實行，這不就成了革命

騙子？

中國革命現在所要打倒的對像，皇帝和軍閥這兩個大敵都消除了，現在第三個敵人便是「飢荒」。國民黨從來對於皇帝，對於軍閥，都是舉國一致，拚死進攻的，但對於「飢荒」却不能一致進攻，這實是嚴重的錯誤。我們應該知道飢荒對於革命的危害，實在比軍閥比皇帝要嚴重，軍閥和皇帝已經失去時代性和社會性，遲早要死亡，飢荒則有一定的規律性，從社會最下層最多數的民衆中生長出來，力量極端偉大，而且充滿着爆裂性，牠能夠摧毀革命的基礎，牠能夠使革命功敗垂成。目前共產黨紅軍的無法消滅，致使整個的中國混亂鼎沸，無法自拔，便是建築在這飢荒的基礎上的。

蘇俄革命爲着撲滅飢荒，列寧「不惜犧牲一切的主義」，要全國一致實行新經濟政策。蘇俄因爲有列寧的指導，全國一致的向飢荒進攻，拚命實行五年經濟計畫，於是蘇俄現在的社會纔能穩定繁榮起來，連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都比不上了。全世界都爲飢荒這個惡魔蹂躪着，黃金國家的美國尙且有失業人口一千萬，德國日本英德法國等就更不必提，可是蘇俄恰恰相反，大革命後幾千萬的失業人口都已有了職業，連體力薄弱的女子也都有職業了。

蘇俄革命因爲是走的馬克斯的不完全的路綫，中途遇到飢荒，逼得要「犧牲主義」以實行新經濟政策。何況在中國，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方法，用民生主義的方法去撲滅飢荒，是孫中山先生早已規定了的路綫呢？民族主義叫我們去打倒滿清皇帝，打倒帝國主義，民權主義叫我們去打倒跋扈的

軍閥，打倒無恥的政客，最後的民生主義則很明白的叫我們去打倒飢荒。而且孫中山先生又親自規定了打倒飢荒的方法，從錢幣革命（下文尚須詳細說明）起，到實業計劃，以及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這都是孫中山先生一貫的打倒飢荒的路線。我們既一致自承為中山主義者，矢志要完成中國革命，那末我們對於孫中山先生的完善正確的主張應如何堅決執行呢？

革命纔走到半途，同志們便就把革命根本重要的任務忘掉，把民生問題棄置不顧，惟個人權位是爭，各執着半截槍桿子互相毆殺，這痛心的現象，我們不敢罵誰是孫中山先生的叛徒，批判誰是反革命，誰是不革命，但我們可以正確明瞭的斷定，歷史的車輪將要把這些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者碾為粉碎了。

第二 銀行政策

中國要消滅飢荒，解決民生問題，只有從發展生產，解決普遍的失業現象着手。但講到發展生產，當前最困難的問題便是資本，沒有資本是什麼事都不能做的。

在社會經濟落後的時代，資本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有了勞力，土地，原料，便可以從事生產。但自

從社會脫離了封建經濟制度，脫離了自給自足的經濟以後，這個資本二字所代表的便不是勞力土地原料，而是在代表貨幣了。現在人們談起缺少資本的話，便是指缺少貨幣，決不是指缺少勞力土地，也不是缺少原料。

現在的中國，生產落後到萬分了，可是說到勞力土地原料的話，却還是很豐富。四萬萬的人口，有一萬萬以上的人在賦閒着，那就是中國現在有一萬萬人以上的勞力在廢置着。至於土地，則至少有數百萬數十萬方里的土地在荒廢着。原料則中國處在溫帶和鄰近熱帶上，植物多，礦藏亦多，原料真是豐富得很。中國既有這樣多的勞力土地原料閒置着，那末爲什麼還說發展生產沒有資本呢。這中間的道理很簡單，因爲沒有貨幣去聯絡牠們，不能使牠們互相發生關係，於是雖有着衆多的勞力，廣大的土地，豐富的原料，但終不能從事生產。換句話說，就是中國有這許多勞力土地原料的生產條件，但因爲沒有貨幣這個經濟紐帶，於是生產被限制着，一步都不能發展了。

貨幣本是政治性的經濟產物，是應着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社會的勞動的分工」完成了堅強的基礎，社會開始走入商品經濟制度，便必然有貨幣出現。從古代物物交換起，到現代嚴密的金融制度止，這中間，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貨幣變遷的歷史。人類最早的貨幣是龜貝獸皮以及其他各種金屬器具，其次是各種鑄成定型的金屬物，最後則有紙幣出現。我們如欲把貨幣的歷史劃分出階段來，那末可指龜貝獸皮以及金屬器具爲自然物貨幣時代，各種鑄成定型的金屬物爲鑄金貨幣時

代，紙幣流通爲信用貨幣時代。

貨幣是社會經濟的紐帶，社會上有了這個紐帶在作用着，於是社會的生產與消費纔能平衡發展，社會的經濟組織纔能順利地進步。在自然物貨幣時代，每一個經濟組織祇狹小地限於一個部落或一個地域，水澤的捕魚部落以龜貝爲經濟紐帶，高原的獸獵部落以獸皮爲經濟紐帶，這些部落中的勞動，因爲有龜貝獸皮的流通作用存在，分工便漸漸精密，而生產工具及生產技術也得有進步了。不過以自然物爲貨幣的時代，貨幣的交換價值寄存于貨幣的自身，很少人爲的拘束。待人類的政治組織到相當完備的時代，人們覺得自然物貨幣的流通諸多不便，便有鑄金貨幣出現。鑄金貨幣時代的社會經濟組織，比較自然物貨幣時代的社會經濟組織，範圍當然擴大得多了。在某一種政治勢力所達到的地方，某一種鑄金貨幣便也流通到這個地方；不論地域有若何阻隔，生活有若何的差異，在一個政治勢力統治之下的地方，總是流通着一種貨幣。

鑄金貨幣流通了一個長時期後，一方面人類的生產力已極度發展，消費力也增高了，另一方面則人類經濟組織的範圍擴大，由一個國家以內擴大到國一個家以外；貨幣需要的數量激增起來，但自然界所能供給的金屬物質却極有限，於是根據信用的原理，而有紙幣出現了。紙幣只是一張紙，牠的本身毫無一點價值，牠比不上一塊金子，比不上一塊銀子，甚至也比不上一張獸皮，一個貝殼，但因爲信用的關係，這印着花紋的紙頭却可以在市場上兌換貨物。以紙幣爲社會的經濟紐帶，那便是信

用貨幣時代了。

貨幣由自然物貨幣進展爲鑄金貨幣，更由鑄金貨幣進展爲信用貨幣。這些變遷都是隨着社會的需要而出現的，並沒有什麼上帝在暗中主持，也沒有什麼鬼神在其間播弄。倒是人類如不能隨着社會的需要把經濟紐帶——貨幣——時時改變以求適應人類的經濟反要發生混亂的現象呢。

自從「產業革命」以後，機器的生產工具出現，「社會的勞動的分工」日趨精密，生產力突飛猛進，商品經濟張開血盆大口把整個的地球都吞下了，於是鑄金貨幣這個經濟紐帶因受物質的限制，再也維持不下這廣漠無邊的市場，鑄金貨幣不足以供需要，便走上信用貨幣制度，以紙幣爲流通工具了。可是現代紙幣的信用建築在現金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築在物品的基礎上，因之社會的商品價值與貨幣價值相差過於懸殊的時候，信用恐慌仍不可避免的要出現，經濟秩序就仍要發生混亂了。現在世界各國大都以金爲主幣，各國的商品當然都以金價計算，商品在各國是日夜不息地在趕造出來，但金鑽的開採却很少了；這樣，商品的產量很快的上升到一百一千以至於一萬的數量，而金子的產量則始終徘徊在一百的數量上，這樣數量相差懸殊的金子，大家還硬把牠當作流通商品的經濟紐帶，還會不發生恐慌或混亂嗎？一尺長的紗帶去圍二尺粗的物體，紗帶尚不免於斷裂，何況以一寸的金子紐帶去約束一丈以上的商品，這紐帶會不斷裂而現出恐慌來嗎？

在這「資本主義第三期」的世界，要免除恐慌，只有澈底實行信用貨幣制度。依着社會經濟的

需要，以商品（黃金和白銀也作為商品）作保證發行充分的紙幣，俾貨幣這經濟紐帶能夠發生充分的作用。否則就使蘇俄，五年或十年以後也仍要鬧着激烈的經濟恐慌呢。

作者因說到「中國有這許多勞力土地原料的生產條件，但因為沒有貨幣這個經濟紐帶，於是生產被限制着，一步都不能發展了，」便把貨幣的原理冗長地敘述了一下，現在可以把話頭拉回來了。中國既有勞力，有土地，有原料，生產條件可說完全具備了，但為什麼還鬧着經濟衰落，物質不足的飢荒呢？說中國「沒有貨幣這個經濟紐帶，」那實在是冤枉，中國不是同樣流通着貨幣，不是同樣使用着貨幣嗎？「經濟紐帶」是有的，不過太脆弱，太微細，對於社會經濟的作用太不充分罷了。

中國貨幣在制度上既沒有統一，「兩」與「元」並用，「大洋」「小洋」「銅元」早晚市價各有上落；在地域上則更不統一，北方有老頭票，南方有香港票，老頭票和香港票都比中國票通行；雲南的幣制與四川不同，四川與廣東不同，廣東與上海又不同，西藏蒙古則簡直不要說起，幣制紛亂到這般田地，我們憤慨地說中國沒有貨幣也可以。前面說過了，貨幣是社會經濟的紐帶，是發展生產的要素，中國要解決社會經濟，要發展生產，第一步必先解決貨幣問題。貨幣問題，中國早已有很多人注意了，但因認識的模糊，誰都拿不出具體實行的辦法。「廢兩改元」咧，「金本位」咧，「萬國複本位」咧，「鬧得烏煙瘴氣眼花撩亂，可是這始終是鬧鬧而已。任憑馬演初李權時口齒靈利，筆頭生花，但理論是理論，事實還是事實。國民政府爲了幣制問題，還特別聘請了幾個外國顧問，但外國顧問也沒有

三頭六臂，貨幣問題仍是解決不了。

孫中山先生在「錢幣革命」中說：「錢幣之革命者何？現在金融恐慌，常人皆以為我國今日必較昔日窮乏，其實不然，我之財力如故，而出產有加，其所以成此窮困之現象者，錢幣之不足也。錢幣為何？不過交易之中準，而貨財之代表耳。此代表之物，在工商業發達之國，財貨溢於金銀之千萬倍，多以紙票代之矣。然則紙票者，將必盡奪金銀之用，而為未來之錢幣，如金銀之奪往昔布帛刀貝之用，而為錢幣也。此天然之進化，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今欲以人事速其進行，是謂之革命，此錢幣革命之理也。其法為何？即以國家法令所制定之紙幣為錢幣，而悉貶金銀為貨物，國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紙幣，嚴禁金銀。其現作錢幣之金銀，祇准向紙幣發行局兌換幣紙，不准在市面流行。如此，則紙幣一出，必立得暢行無滯，財用可通矣。」

這裏，我們可以明瞭孫中山先生解決貨幣問題的方法，他沒有斤斤於「元」「兩」之爭「本位」之爭，直捷痛快的就是主張打消鑄金貨幣制度，實行信用貨幣制度。一切元兩問題，本位問題，都只是皮相的爭論，只有澈底實行信用貨幣制度，纔是根本的解決方法。

劉有莘在中央半月刊第十六十七兩期發表「革命與幣制」一文，他說：「如果我們要想根本改革現行貨幣制度，第一要使用一種永遠不受物質生產量的支配的東西，來做真正交易中準的貨幣本位，將現有的制度一律廢除，第二，便是要把交通運輸大宗生產分配和消費及調劑需要與供給

的。事。件。都。給。國。家。去。管。理。指。導。或。支。配。要。是。這。樣，纔。有。辦。法，纔。使。幣。制。合。乎。幣。制。原。理。與。國。民。經。濟。的。要。求。」

劉氏第一的主張是明顯地主張實行信用貨幣制度，第二的主張則是明顯地主張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因為不實行信用貨幣制度，幣制便不能「不受物質生產量的支配」，不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健全的信用貨幣制度便無從開始，無從成立。同時，不實行信用貨幣制度，國家資本主義也只是一個空名詞，因為資本既無從調集，那末國家發展生產的話不是「紙上談兵」嗎？

二

對於一個新制度的產生，我們絕不能認為是一紙命令或幾句空話所能成功。尤其貨幣問題是經濟方面的任務，完全建築在物質的基礎上，決非政治權力所可一手包辦，更非單純的政治權力所能支配。貨幣是經濟方面的東西。經濟方面的東西自然非用經濟的權力去支配不可。直接用政治權力去支配貨幣，社會徒然惹起紛擾，結果一無所成。雖然貨幣是政治性的經濟產物，但我們相信，政治未握有充分的經濟權力以前，政治萬萬沒有權力去干涉或支配經濟。中國幣制的混亂和幼稚是有目共睹，老幼咸知的事實，國民政府對此也未嘗不想改革，但終以國民政府的經濟權力太薄弱，雖欲加以支配，干涉，改革，而事實上不可能啊。

既不能直接用政治權力去支配而改革貨幣制度，那末用什麼方法實現信用貨幣制度呢？關於這個，我們仍得從貨幣本身的歷史和中國的經濟現狀去檢討。最初的貨幣只用作交換工具，在原始經濟時代，在封建經濟時代，貨幣唯一重要的作用是作交換工具，作為調劑生產與消費的經濟紐帶，待轉入商品經濟時代，轉入現代的金融經濟時代，則貨幣兼任做生產資本了。在前一時期，貨幣只是消費資本，在後一時期，貨幣兼作生產資本了。社會經濟愈進步，社會的財富愈增高，貨幣的任務便愈擴大，其數量的需要也愈膨漲了。社會的貨財價值超過貨幣價值幾十倍以至幾千百倍以上，社會感覺貨幣的缺乏，經濟不便流通，便自然而然的出現了信用制度，如借貸，抵押，賒欠，期票等等，這些信用制度都是因為貨幣不足而出現的。隨着信用制度的出現，社會便跟着成立了許多特別的經濟機關，如當舖，錢莊，銀行等類。當舖，錢莊，銀行不是生產機關，也不是商品運輸或分配機關，更不是什麼國家的政治機關或教育機關，而是一種調劑金融的信用機關。我們如說國家的政府組織是政治權力所寄託的機關，那末這些當舖，錢莊，銀行的信用組織便是經濟權力所寄託的機關了。剛纔說政治權力不能直接干涉改革幣制，現在發現了這些有經濟權力的信用機關，對於解決貨幣問題便有了線索了。

當舖是農工小商人的信用機關，錢莊是小中資本家及地主的信用機關，銀行則是大資本家及金融資本家的信用機關，中國這三種信用機關，錢莊銀行處於互相抗衡的地位，當舖只是一種從屬

的信用機關而已。當舖對下雖有力量各自去支配一部分農工小商人，但在整個的經濟權力上講，則當舖的權力却是很微弱，必須依附於銀行或錢莊。

錢莊至今還能和銀行抗衡，這很明顯的證明了中國的封建經濟還自有其根深蒂固的基礎。錢莊放款的利息並不低，再經過兩與元的往返折合，簡直與高利貸者差不多，但一般中小企業者因資本短少，除向錢莊告貸外實無他法。錢莊放款的利率既高，其吸收存款的利率自然也比較的高，因之錢莊在營業上仍舊可與銀行有競存的餘地。許多銀行垂涎而要沾染高利貸的利益，還與錢莊暗中聯合呢。

中國的銀行制度現在還極幼稚，雖有政治上及經營上的各種便利，如特許發行紙幣經營債券等等，但終因客觀條件的產業落後和其主觀條件的組織不普及與資力薄弱的關係，還未能形成巨大的經濟權力。在國際間不能與各外國銀行競爭，在國內也不能和錢莊銀號競爭，在生產上更說不到什麼集中管理或支配的話了。本來銀行的基礎完全建築在信用制度上，銀行離開信用便一天都不能立足，非馬上倒閉不可。可是中國的信用制度並沒有完全為銀用行所利用，第一因為不平等條約的壓迫，外商運用可怕的鉅大的資本在中國開設銀行，一方面吸收了多量的存款，一方面又發出多量的外國紙票，差不多把中國的信用制度利用了十分之五以上；第二因為國內經濟的封建勢力的殘留，高利貸的錢莊當舖仍佔優勢；第三因為政治混亂，軍閥橫行，產業衰落，交通阻礙，銀行事業更

隨在遇着障礙；所以現在中國的銀行所能運用的信用力量，非但不到十分之一，也許還不到百分之一呢。中國的銀行如能夠充分地運用信用的力量，那末牠的經濟權力毫無問題的可以統御全國，並在國際間佔得重要的地位。

要改革貨幣制度，必須有統一而強大的經濟權力，有了一個統一而強大的經濟權力的機關，那末由這個機關去實行改革的計劃，國家制定貨幣的法律，從旁用政治權力去幫助，改革幣制便很容易實現了。中國現在這樣的經濟權力的機關還沒有，錢莊當舖是行將沒落的東西，銀行則都很幼稚，如要創造這樣的統一而強大的經濟權力機關，並且要這機關將來不違背民衆的利益而常常受着國家和民意的支配，須從整理現存各銀行及各信用機關入手：

A 用科學的合理化的方法，在政府管理監督之下，實行銀行統一政策。

B 設立普遍全國的銀行網。

C 確立信用制度，實行信用貨幣制度。

D 銀行管理並監督交通運輸生產及分配機關，實行國家在社會經濟及發展生產方面的任務，並助理國家財政事業及公共事業。

上述四項，都是決定銀行政策所不可缺少的骨幹，缺少了任何一項，銀行就不能成爲社會的經濟權力的機關，就不能充分的調劑金融發展生產了。現在再逐項加以補充，說明於下：

A (用科學的合理化的方法，在政府管理監之下，實行銀行統一政策。) 調劑金融，這原是關係整個社會利害的事業，像交通事業的郵電鐵路一樣，照理是應由國家專營的。但因為習慣的關係，現在各國除蘇俄外，銀行都准許人民私營，中國是產業後起的國家，對於銀行許人民私營的事當然也不能例外。可是銀行由私人經營，有兩個最大的弊病：第一，私人經營的目的專於牟利，很少適應社會的需要；第二，私人經營，必然造成多頭競爭的無政府的狀態，同一事業分割着許多機關（上海有銀行錢莊二百家）執行，徒然多費開支。一九三〇年世界經濟恐慌出現，美國銀行經不起打擊而倒閉的有二千餘家。最近美國經濟恐慌，全國銀行都奉命暫行停業。上海近年來頗盛行銀行熱，銀行公司風起雲湧的成立起來，這投機潮遲早總要引起大混亂。為銀行本身的前途打算，為中國的社會經濟打算，中國的銀行必須實行合理化，歸併各錢莊銀號銀公司及銀行為一個大銀行，實行統一銀行組織，成立一個總行，這大銀行便作為國家銀行，將現有各銀行各銀號一律作為國家銀行的分行。國家銀行除規定由國家撥入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的股本外，其餘均由人民投資，但銀行業務所得的純益，須以國家為主體。人民的股份除支付官息外，紅利規定以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二為限，多餘的純利即作為國家的收入或擴充為國家在銀行中的股本。國家銀行的董事十分之二，或三由政府委銀行專家及經濟學專家充任外，其餘當然由股東會選出。中國成立統一的國家銀行，如按照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需要，其股本至少須五十萬萬元，五十萬萬元的股本或有人驚為太大，擔憂集合不

起來，其實中國雖窮，祇歸併各銀行莊號的股本，也許就已經超過此數了。中國有此雄厚資力，對內既可充分的力量調劑金融發展生產，對外也可以免強和帝國主義的金融勢力抗禦了。

B (設立普遍全國的銀行網。) 銀行是調劑社會經濟的金融機關，牠的工作是便利人類的經濟生活，那末爲社會人羣的福利計，爲銀行業務的發展計，銀行必須隨着人類足跡所達到的地方設立分事務所。中國在目前，因爲政治混亂關係，銀行幾乎完全集中在上海、廣州、天津這幾個地方，此外如新疆、青海、西藏、蒙古等省簡直就和外國或荒島一樣，一個銀行都沒有。試想，銀行是經濟的中心機關，沒有銀行的地方，產業會發達嗎？英國是資本主義較老的國家，英國銀行的分行數目在一九一〇年就有七千一百五十一個，現在當然更多了。中國的人口比英國多幾十倍，土地也大幾十倍，那末分行的數目至少也要和英國相等。中國有二千多縣城，加上各重要市鎮及通商口岸，國家銀行設立銀行網，成立五千個分行實是最低限度的數目。中國現在內地人口過庶，急欲移民邊疆，對於邊疆各地的銀行網就更爲重要，因爲資本的足跡所到的地方，人口總是隨着湧過去的。淺見的銀行家常以爲荒疆無利可圖，殊不知把荒疆變成熟土，獲利纔真大得無可計算。香港是個人煙絕跡的荒島，但英帝國主義把香港開闢成熟土，把香港變成繁華的市場，誰能計算得清英國人在香港所得的利益呢？銀行在人口庶密的地方所獲得的只是蠅頭微利，在巨荒絕域的地方纔能獲得無限的寶藏。所以中國國家銀行不設立銀行網則已，如欲設立銀行網，設立邊疆的分行，是不可忽略的。又全國設立五千

個分行，驟然看去似乎驚其太多而不易成功，但事實上把各地錢莊歸併起來，決當超過此數，國家銀行除添設若干邊疆的分行外，在內地只要把各錢莊銀號改造一下就好了。

C（確立信用制度，實行信用貨幣制度） 銀行的基礎是信用，最重要的任務便是調劑金融，發展生產，作支付的中人，把不活動的貨幣資本變為活動的貨幣資本，把不活動的生產條件（勞力，土地，原料）變為活動的生產條件，使社會上一切無價值的東西變為有價值的東西，不生產的東西變為生產的東西。銀行的機能是很偉大的，但視我們巧妙地運用而已。中國號稱窮乏的國家，國富總數三八，二八九百萬元，每人平均不到百元，是世界上最枯窘的國家，連英國的殖民地印度（一三八元）都比不上。如能確立信用制度，使國家銀行得盡量發揮其機能，國民經濟得盡量發展，那末不要幾年，中國的國富一定能上升幾倍。中國確立信用制度的辦法，在國家方面是清理債券，確定預算，劃一稅制，在人民方面是消滅高利貸，國家銀行設立普遍的低利的當舖，厲行生產合作消費合作。不過，確立信用制度要點在於國家銀行，國家銀行根本的信用機能又在發行紙幣。中國要驟然完全用紙幣去流通市面，取締一切的現金，驟然實行信用貨幣制度，那顯然是不可能的。中國國家銀行要實行信用貨幣制度，第一步是確定十進位（照數學原理，則十二進位就更好。）分，角，元，「孫」的幣制，取消「兩」及其他小洋銅元等雜幣的流通；這事件的實行，是一方面由國家制定公佈幣制的法律，銀行則依社會的需要發行一分的銅幣，一角一元的銀幣，「一孫」「五孫」「十孫」的金幣，和五分一

角五角一元五元一「孫」五「孫」及十孫」的紙幣。金銀銅幣及紙幣的印造，當然由銀行自己去執行，政府和人民祇有監督的權限。幣制統一以後，待社會行使便利而發生了信用，那時再由國家改訂貨幣的法律取消金屬貨幣，行使紙幣，而實行信用貨幣制度，便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了。

D (銀行管理並監督交通運輸生產及分配機關，執行國家在社會經濟及發展生產方面的任務，並助理國家財政事業及公共事業。) 社會是由兩種組織的交互錯綜而構成成功的，一種是政治組織，一種是經濟組織，前者如教育機關倫理機關公安機關而國家為其總樞紐，後者如生產機關運輸機關分配機關而銀行為其總樞紐。政治組織是着重於人類精神生活方面的組織，經濟組織則是着重於人類物質生活方面的組織，社會的這兩個組織是交相為用，並行不背的。國家的組織須有政治基礎，同時也須有經濟基礎，但歷來的國家都有一種錯誤傾向，就是專重政治而把經濟忽略了。作社會運動的人因憤於人類物質生活的沒有保障，遷怒於國家，無政府主義者根本主張不要國家，共產主義者則主張國家逐漸衰落而死亡，其實這都錯誤了，人類的經濟組織政治組織只有愈趨愈嚴密，而國家的基礎也是愈趨愈鞏固的，除非地球消燬了，國家的組織纔不得不消滅。中國革命無疑義的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那末中國的國家無疑義的便須兼負起社會經濟方面的任務，走上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中國現在的國家驟然要管理社會的經濟組織，顯然不可能，如用政治權力去強行干涉經濟事務，也徒然惹起騷擾，無補於事，但用銀行去管理經濟事務，用銀行去管理各種經濟機關，那

却是輕便簡捷的道路。一切經濟事務都需要資本，銀行正是資本的淵源，一切經濟機關逃不了金融的支配，銀行正是金融的中心機關。銀行自有歷史以來，就無時不站在管理並監督社會經濟組織的地位上了。更明顯的例子，則是歐美各金融資本主義的國家，政府並沒有授與銀行管理社會經濟機關的權力，但事實上少數銀行巨頭已經利用其金融勢力支配着全國的生產機關了。銀行的管理社會經濟組織，就和國家的管理社會政治組織一樣，已成爲不可逃避的事實。同時，銀行與生產也是相依爲命的，銀行離了生產便不能發揮機能，便不能生存；生產沒有銀行，便不能發展，便不能進步。中國是產業最落後的國家，要想把中國從大饑荒中救出來，自非利用銀行這個偉大的機關去發展生產不可。

近年來中國困於天災人禍，產業衰落到極點，各地都在鬧着大饑荒，於是很多的先生們羨慕蘇俄的新經濟政策，亂紛紛的三年計劃五年計劃六年計劃以至於十年計劃簡直充滿了耳鼓，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可是沒有資本，這些計劃都成了畫餅充飢，紙上談兵。又有些人抄襲了孫中山先生經濟主張的後半段——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要大借外債來發展生產。可是這夢想的不能實現，就如天上美麗的繁星不能移植到地上來一樣，永遠是個夢想，永遠救不得中國。（未完）

牛欄屋裏的喜劇

周毓英

革命的村第二篇

社 會 主 義 月 刊

阿生帶着老婆和女兒住進了稅平老板的牛欄屋後，態度是更恭敬更熱心了。阿生的一家實際上做了稅平的家奴，但這却正是阿生和妻女們所引為安慰的，從此他們一家有靠山了。奴隸的忠實，兒子的孝心，這些奴隸的美德——都由阿生傳授給他的老婆和他的女兒。妻丫頭——阿生的女兒——雖尚是天真未鑿的十二歲的女孩子，可是在她的父親和母親的影響之下，却也知道恭敬主人，以至於恭敬主人家一切的人。

稅平家的人口原很不少，要是在早前二十年或三十年的話，早已成爲一個大家庭，孫兒孫女成羣了。現在不知怎樣，大兒子二兒子早已是生子的年齡，但二兒子老是賴着不肯討老婆，大兒子夫妻不和，七八年不生養。四個女兒却都出嫁了。第一第二兩個兒子雖已半老年紀還終年在外面讀書，遇着假期也是很少歸家的。惟一的一個小兒子銀銀留在家裏進學，年齡是十五六歲了，但在稅平家中還當作五六歲的小孩看待呢。

銀銀在自己的大家庭中沒有一個玩伴，斐丫頭來了算有了一點補償。斐丫頭雖說不是怎樣聰慧玲瓏的女孩子，呆笨的習性不很能合銀銀的心情。但銀銀陷於沙漠的枯寂中，斐丫頭縱使一勺黃水也是膠渴的東西了。

斐丫頭敬重着銀銀，自然願意伴銀銀玩。每逢銀銀在家的時候，斐丫頭就使有事情要做，銀銀只要招招手，她便走過去其實斐丫頭自己也是愛玩的，有銀銀做護符，少做了事也不至受責罵。

在無論怎樣微小的事件上，斐丫頭總覺自己和銀銀隔着什麼界限。不然，爲什麼斐丫頭定要稱銀銀三少爺，而銀銀稱自己總是斐丫頭呢。有幾次不當心稱了銀銀的名字，她的母親在傍邊趕上來便是兩巴掌，還罵：

「這賤丫頭！三少爺的名字，你可以張口就喊的嗎？下次再喊，撕破你的嘴！」

在銀銀，他可以隨意開玩笑，隨意用卑污的稱呼加給她。斐丫頭的母親不說什麼，老板娘還看着兒子笑，反而歡喜起來。

銀銀常常愛把斐丫頭的名字當山歌唱：

「斐丫頭！

辰丫頭！

……

……」

這樣，也沒有誰來責問銀銀一聲。祇是衆人聽見銀銀這樣唱，大家笑起來。

有一次銀銀唱得太利害了，斐丫頭逃到門口，銀銀便追着唱到門口，斐丫頭逃到廚房裏，銀銀也追着唱到廚房裏。她恨極了，立在廚房門口輕輕的答應了一聲：

「斐丫頭是你的娘！」

當時銀銀是依舊唱着，沒有注意她的說話。斐丫頭的母親正在灶上燒菜，立即把鍋鏟投在竈上罵：

「你這不知上下高低的小倡婦，也敢大膽罵少爺了……」

罵着，趕過來捉着斐丫頭的耳朵先打了三巴掌，又拉倒在地上推着，

「少爺追出追進罵了我半天，我只回了一聲，爲什麼便要打我呢？少爺罵人就不算事！」

「你嘴兒……」斐丫頭的母親一拳推了下去，「少爺整天罵你，你也得受下來，他是罵着玩的。你罵少爺，斐丫頭是你的娘！」給老板和老板娘聽到了，那得了嗎？老板娘生氣起來，我們一家人到那裏去吃飯！給你吃了幾天飽飯，就無法無天，說話不分尊卑上下了！今天不打你，下次一發得了勢，那不要打碎一家的飯碗……」

銀銀見打斐丫頭，愕然的呆住了。他想斐丫頭受了自己的罵，又還要受她自己母親的打，銀銀抱

不平了！

「鄭媽！莫打她，我們罵着玩的。」

「呢，少爺，你不要管。這丫頭無法無天……」

妻 丫頭的母親說着，又推了幾拳。

「你再打，我就叫我媽來，看你還打不打人？我們玩的，要你來打人做什麼——妻 丫頭！跟我到廳上去，不要在這裏受你媽欺侮！」

銀 銀發着怒，拖着妻 丫頭的手出去了。

銀 銀 少爺的話又和經典一樣，妻 丫頭的母親不敢說什麼。眼迷迷的看着銀 銀，懷着一種神祕的感情退回灶頭面前去！

「呢……女兒的事……媽也管不得了！只好由少爺的高興！」

★

★

★

★

曆陰的正月算是春天了，但實際還殘留着嚴冬的氣候。霜是不下了，可是在太陽沒有出升以前，那侵肌透骨的寒冷還和下霜時候一樣。牛欄屋裏是不分什麼冬夏的，像刻定了的版式，不論天冷天熱，功課永遠不變。

每天早晨大約四點鐘的時候，雞啼了第三遍，瓦縫裏略有些白光透進來，阿生的老婆便在黑暗

中摸索摸索的穿好衣服，到老板家燒早飯去了。阿生聽老婆走了後，便也跟着起身穿衣服，下田做生
活。天氣溫暖的時候，婁丫頭也是要被阿生趕下床的。不過在冷天，婁丫頭可以多睡一刻。

這天，阿生照例摸索着穿了棉襖棉褲，揉着眼睛，噙着早烟管上毛廁，上了毛廁再到老板家去掘
鋤頭下田。但走到老板家的門口，想起烟盒落在床上，又折回牛欄屋來。

噙着空了的早烟管，急忙的走回牛欄屋，跨進了門，阿生一心想着烟盒子，無心顧牛欄屋內的事
物，低着头直向草蓆隔着的房裏走去。才走近草房三四步路，阿生忽然觸了電般呆了。他知道房裏
只有婁丫頭一人，但現在裏面却傳出男子罵人的聲音來：

「鬼丫頭！你媽會打你……」

阿生像被什麼吸住着，噤着說不出話來。他恨恨地想，這真不成個世界了，清清早起，便有狗男女
偷到我的房裏來野合，這成什麼！他又想在一個不通人事的女兒面前做那樣無廉恥的把戲，簡直是
敗壞風化啊！或許婁丫頭被那對狗男女縛住了手足，口裏塞着棉花，眼睛也給蒙住了。

在一剎那的時間，許多可恥事象的變化在阿生的眼臉前都似映過去了。

阿生定了一下神，正想運着氣力衝進去捉住野合的狗男女，忽然婁丫頭柔弱的哀音毒箭似的
射着了阿生的神經：

「三少爺！不要欺侮我囉……」

「……………」

「三少爺！你這是欺侮我啊！你說不欺侮我，今天又欺侮我了……」

「鬼丫頭！銀銀像在用力捉住着妻丫頭，騰着口氣恨聲的罵，

—— 啊！這禽獸！

阿生噤着叫不出話，恨恨地暗罵了一聲，衝進草房裏去了。

濃濃的暗光中，阿生睜大了眼睛，看着銀銀和妻丫頭都精赤條條的，互相扭着在床上打滾。妻丫頭掙扎着滾了過去，銀銀又拚命的用力拖翻了過來。銀銀想用武力征服妻丫頭，緊握着她的雙手，用全身的重量壓住着她，妻丫頭盡力移着身體讓到橫裏去，但銀銀的身體也跟着移過去。兩個人掙扎了一下，銀銀終於乏力地伏在妻丫頭的胸口上嘆着氣：

「我以後再不給東西你吃，不買東西給你了。我還要叫我媽打你呢。你這賤貨，將來我也要打你不識抬舉的！」

「哦哦！這是欺侮我啊！」妻丫頭喘着氣在哭了。

「欺侮我！我沒打你罵你，我是愛你啊！可是你不識抬舉，」銀銀手指點着妻丫頭的臉，火赤的兩眼射照着，氣勢像要吞下妻丫頭。

照着阿生焚燒着的感情，他真要一腳跳上去，粗壯的拳頭一下就可打死銀銀的。但當阿生心中

作那樣的預備，脚提起來的時候很奇怪，來了一種神祕的魔力，這魔力像有千鈞之重的絆住着他的脚。拳頭上辣辣地發着熱，腦際火急似的湧想着「打死這畜生！」但脚蹠像被魔鬼吸住了一寸都難移動。阿生掙扎了一下，終於像有一桶冰水從頭上淋下來，只得倒抽了口冷氣想：

——唉！他是老板的兒子啊！

銀銀壓在妻丫頭胸上換了口氣，恢復了點氣力，又第二次對妻丫頭用強了。阿生立着在蹬脚，窘急得叫了出來：

「啊啊！你不是三少爺嗎？這大清早起，你到牛草房裏來做什麼呢？少爺怎麼身份也做這禽獸？」

銀銀想不到阿生這時候會回來，聽了阿生的聲音，好似空中驟然落下一塊冰，他的全身結在冰塊裏了。銀銀打了個冷瘧，噉的跳下了床，拾了委棄在地上的皮袍，披在身上，提着褲子一壁走一壁穿。出了草房門，有意無意的掩飾說：

「爸爸叫我來看看牛，看牛在牛欄裏安穩不安穩。依了爸爸的話，就急急的鬆着衣服來了。不料我跨進戶樞的時候，偶然打了個噴嚏，妻丫頭在床聽見了，便罵我「狗打嚏，天要下雨！」我聽了不高興，說了她幾句，要她規規矩矩，不應當和少爺開玩笑。我這樣說了幾句，她却風風騷騷的罵得我更利害了。她那半帶着媚意罵我，小鳥樣的聲音，她是存心來勾引我，誘惑我的。我被她逗得又氣又憤，衣服也趕不及扣，便鬆着衣服想去打她。那知她的氣力和我差不多，我用盡氣力都捉不住她，反被她踢了

幾脚。最後我氣極了，用全身去壓住她，可是我還沒有捉得住她，她又一脚把我的褲子踢下了。後來她又把皮袍也搶下來，投在床下。」

婁丫頭捧着臉伏在床角裏痛哭。阿生搖搖頭，默默地拾起打落在地上的破棉被，給女兒蓋上。對着床裏恨恨地嘆了口氣，捶一下胸，便走出草房來。

銀銀還拖着鞋皮癡呆呆地立在牛欄面前，褲子和皮袍都穿好了，縳着眉頭雙手恨命地抓頭皮，好像把頭髮抓光了，苦悶會發洩出來。

「唔！還不走。」阿生和平的說，「你立在這裏，等我去叫了老板來嗎？」

「啐！你敢嗎？」銀銀鼓鼓眼睛，「明明是婁丫頭不應該，你却想到我爸爸面前去造謠，把過失推到我身上去嗎？——也好！你去造謠，我是不怕的。只是當心自己吧，我要敲碎你的飯碗！我怕你嗎？哼！」

提起飯碗，阿生更和平了：

「那末，你倒是做了好事情了？你做了壞事情，還要禁止人家說話嗎！」

銀銀低下了頭，好久沒有答話，伸着左手在皮袍的插袋裏摸索了一下，忽然摸出來兩個雙角銀毫子，手一揚，向阿生面前擲了過來，怒視着說：

「識相點！拿去抽煙！到我爸爸面前去造謠你沒有好處，你會吃苦頭呢。」

阿生憤恨着，沒有聽清銀銀的話，只憤然的一腳踢過去，銀角子噹噹的滾進牛草堆裏去了。阿生氣得紅漲了臉，手指着銀銀說：

「只有你們這些刮皮的老板們，才會把銀錢看得泰山那樣重。刮了人家的錢，還用錢買賄人家的心。世界也許有一天要毀滅，你們這禽獸却死不盡！」

「啊！你胡說八道的罵我的爸爸，還咒我們死呢。好的，你先生告訴我爸爸，我再把你罵我們的話也說給爸爸聽。」

「這畜生！」阿生無可奈何的嘆了口氣。

「呢！你罵畜生，那又是罵了我的爸爸和媽媽，這我也要去告訴的。罵我不算事，還罵我的爸爸和媽媽呢。難道爸爸媽媽也做錯了事嗎？」

銀銀說着話，捧了些草放入牛草桶裏，撲掉身上的灰塵，搖擺着出去了。阿生茫然地立在後面看着，焚燒着的情感，現在冷下去了。阿生在稅平家，恥辱和壓迫，時時刻刻都會引得心弦緊張起來，但每次都是阿生屈伏下去。現在他給銀銀幾句指摘後，緊張着的感情便也寬弛下來，終於又是屈伏了。等銀銀走了好久，阿生蹬着腳，頹喪地嘆息了幾聲，也沒有再去看視哭泣着的女兒，恨恨地推着胸部，烟盒子也沒有尋覓，失意地向着老板的住宅走去。到了老板家的門口，要去告訴老板的想念突然映出來，但又像電閃似的突然消逝了。飯碗，飯碗啊！只是他一個人，那還不要緊，可是現在要拖累

老婆和女兒都受餓，終究使阿生畏縮着，把告訴老板的念頭打消了。

—— 忍耐，總是好的！

阿生又想着生平所信奉的經典，他那唯一可以降服外來的恥辱和壓迫的經典，他心平氣和了。

「該幾個臭錢，不要作威作福，將來有報應啦！」

阿生自言自語的點着頭，掘着鋤頭下田去了。

徵稿啓事

本刊爲思想界公有的刊物，竭誠歡迎外稿。但草創伊始，實力薄弱，不能云報酬。如蒙同情而惠以宏著，揭登後敬致紙墨費每千字一元。徵稿規約，將來經費稍裕時當另行訂立。惠稿請寄發行所轉。

徵求預定代理人

本刊擬在各地及各大學中學徵請預定代理人，以便長期定閱之讀者。望愛護本刊而肯爲推銷者，請向本刊發行所索取預定冊簿爲荷。

優待紀念定戶

凡在本刊創刊號出版五月以內，定閱本刊全年者，定費減收半價。半年不定。優待期限定二十二年七月底截止。

社會主義月刊

第一卷 第二期
本期每冊售銀一角五分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社會主義學會

發行人

顧修堅

發行所

上海赫德路元福里二八二號
上海赫德路元福里二八二號

總代派處

新生命書局
上海望平街

預定價目

每月一冊	零售每冊銀一角五分	寄費二分
半年六冊	預定連郵費銀一元	
全年十二冊	預定連郵費銀二元	
國外每冊再加郵費銀一角		

廣告刊例

地位	全頁		中頁		四分之一	
	底封面	封面及底封面裏	封面及底封面裏	封面及底封面裏	封面及底封面裏	封面及底封面裏
普通	六十元	五十元	三十元	二十四元	十三元	十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長期另議。	三十元	十八元	十元			